

明代長城線外的森林砍伐

邱 仲 麟*

摘 要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明代長城以北的森林遭受砍伐的背景，首先是基於生活上的燃料問題，軍士常越界到國防線外採集薪柴；其次是為修建營房與防禦工事（如修長城），派遣較大規模的部隊在界外砍伐木材；其三是為了籌措每年撫賞「屬夷」的銀兩，令軍士出境伐木或樵柴運回賣錢。另外，為了解決居民建材缺乏與燃料不足問題，有幾位官員曾率領部隊出界以保護住民進行砍伐；但也有許多將領為謀取私人利益，強制士兵到邊外伐木運入內地販賣。依照明代律令，以上各種情況，即使是為公務，出邊還是違法。1570 年代，由於明帝國與蒙古展開定期互市，邊境的局勢相對緩和，後來朝廷准許邊軍每月定期出界採薪，每年春秋兩季各出動部隊越界大砍木材一次。另一方面，蒙古牧民也砍伐塞外的原木，運到宣府、大同等定互市地點，將其轉售予漢人。1598 年以後，遼西走廊松嶺山脈的許多關口出現木市，牧民砍伐森林，順大凌河、小凌河而下，將木材運來貿易。17 世紀初，在北直隸的燕山山脈，也有牧民砍伐塞外的林木，順著灤河等河川運至各關口交易。整體而言，明代最後的六、七十年，長城以北的森林遭到砍伐的程度較前增加。

關鍵詞：燃料、建材、修長城、賞賜牧民、木材貿易、森林砍伐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係國科會計畫「邊界非界：明代軍民在北邊境外的經濟活動」（NSC 97-2628-H-001-025-MY2）的成果之一。感謝兩位審查人，與北京大學李新峰教授及其課堂上多位博碩士生，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投稿日期：100.09.30；接受刊登日期：100.11.28；最後修訂日期：100.12.29

Deforestat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 of the Ming Dynasty

CH'IU, Chung-li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forestation in the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Ming Dynasty. Firstly, soldiers often ventured beyond national defense borders to collect firewoo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fuel used for daily living; secondly, relatively large forces were often dispatched beyond the borders to chop down trees to meet the repair needs of military camps and to carry out defense works (such as repairs of the Great Wall); thirdly, soldiers were often sent beyond the borders to cut down trees or collect firewood, and to have them transported back and sold to raise money to reward the nomadic people that lived near the border areas. In addition, some officers also led troops beyond the borders to protect the people, and they would chop down trees for building material and fuel.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many officers, for personal gain, that compelled soldiers to go beyond national defense lines to chop down trees and transport them back to the mainland for sale. According to Ming Dynasty laws, venturing beyond the border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reasons was illegal, even if it was for official duty. In the 1570s, there was a relative ease of tensions at the borders as trade became more regular between the Ming Empire and the Mongols. Later, the Ming imperial court permitted border troops to go beyond the borders to collect firewood each month and also allowed the dispatch of a large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1; accepted November 28, 2011; last revised December 29, 2011.

force for one logging session during each spring and autumn season. At the same time, Mongol nomads also carried out logging activiti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they transported and sold the timber to the Chinese at such regular trading posts as Xuanfu and Datong. After 1598, numerous timber trade markets emerged at the access points along the Songling mountain range of the Liaoxi Corridor. Nomads chopped down the forests and transported the timber to the trading posts via the Daling River and Xiaoling Riv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here were also logging activities by the nomads in the nomadic region of the Yanshan Mountain range in North Zhili. The timber was transported to the trading posts at the various access points using the Luan River and the others. Overall, when compared to the earlier periods, the extent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was greater in the last 60 to 70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 fuel, building material, repair of the Great Wall, rewarding of nomads,
timber trade, deforestation

壹、前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王曾(977-1038)出使遼朝，在〈行程錄〉記到：古北口以北，「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¹古北口以北即係潮河、灤河流域，森林資源相當豐富；其中灤河上游更是中古所謂「松漠」之所在，松林成片如海。元人白珽(1248-1328)曾有詩云：「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元朝末年，陶宗儀(1329-1410)對此有所解釋：「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²按上都即明代開平衛所在，在灤河主流上都河岸邊，距離大都七百五十里，即約三百二十多公里，而詩中言「童山八百里」，顯然過於誇張，但自遼、金迄至元代，灤河流域的森林遭到人為砍伐，卻是不爭的事實。³

洪武元年(1368)，徐達等北伐至大都，元惠宗（順帝）出走上都，其後雙方來回攻伐，北元勢力逐漸退往漠北。洪武初年，明朝奪取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合等千戶所。但一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前後，北邊國防線才大致定型。這一年，明朝設大寧行都司於大寧，鎮守喜峯口以外地區，東連遼陽，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次年(1388)，改稱北平行都司。遼東行都司所轄三萬、鐵嶺、遼海、廣寧諸衛，山西大同與宣府的各屬衛所，也大多在這段時間設立。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於山西邊外築東勝城，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在此情況下，以開平、大寧為核心，東聯廣寧、遼陽、開原，西聯宣府、大同、東勝及西北的寧夏、甘州等地，明帝國北部的邊界推進至漠南草原，具有一定程度的防禦優勢。但這道防線在不久後有所轉變。永樂元年(1403)二月，明太宗移東勝左右二衛於北京周圍，三月移大寧都司至保定一帶。永樂元年二月，移開平衛於京師附近，四年(1406)二月復歸舊地，宣德五年(1430)

¹ 李燾(宋)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79，〈真宗三十七〉，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頁1796。葉隆禮(宋)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4，〈王沂公行程錄〉，頁232。

² 白珽(元)，《湛淵遺稿》（臺北：興中書局，1964），卷中，〈續演雅十詩〉，頁6218。陶宗儀(明)，《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9，〈續演雅發揮〉，頁109。

³ 景愛，〈平地松林的變遷與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4（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輯部，1988），頁30-33。

南移至獨石堡。邊防內移的結果，遂使既有的優勢盡失，其中大寧內移的影響最鉅，致使兀良哈三衛失去控制，叛服無常。東勝棄守，也使蒙古部族得以出入河套而無阻。鑒於韃靼與瓦剌不時南下，太宗曾多次出兵漠北，但在其死後，長程遠征成為絕響，邊防危機日益嚴重。⁴（參見圖一）整體而言，明朝真正擁有後來長城線以北的地域相當短暫。

二十多年前，歷史地理學者袁森坡曾經提出一個說法：明代毀滅邊外的森林，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為宣德以前為防止北元，正統以後為防止瓦剌、韃靼，經常派遣軍士出邊，深入蒙古游牧之地搗巢、趕馬、燒荒，使草木茂密的草原變成赤地千里的沙漠。而為了防禦蒙古鐵騎，明朝不斷修築長城，當時服勞役的軍士、民夫都住在長城沿線，「他們蓋窩棚、搭馬架、炊食、燒水、燒磚、燒石灰、取暖、紮木架修敵樓，勢必砍伐無計其數的樹木，每日萬竈炊煙，火星飄灑，引起森林火災的事，也必然會時有發生」；另一原因是統治者生活奢侈，大興土木，其使用的木材，「遠的採自川黔和江南，但更多的還是採自長城塞外」，成化、弘治年間，大同、宣府邊外的森林就遭到大肆砍伐，而薊州鎮邊外密邇京師，又有灤河、潮河浮運木材，對森林的破壞必然更加嚴重。⁵袁氏的說法帶有某程度的「假設性」，如說明朝軍士出邊燒荒，「使草木茂密的草原變成赤地千里的沙漠」，就是想當然爾的過度推論，實際上不如想像的嚴重。⁶另外，說沿邊軍士「每日萬竈炊煙，火星飄灑，引起森林火災的事，也必然會時有發生」，並未提出直接的證據。假設邊區山地發生嚴重火災，鎮守官員不可能不報告，而實際上例子極少。而為了說明統治者生活奢侈，大興土木，其使用的木材「更多的還是採自長城塞外」，將馬文升(1426-1510)奏疏所提到的大同、宣府森林遭到濫砍的地點置於塞外，則是對史料的嚴重誤讀。

⁴ 吳緝華，〈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3)，頁 649-660；〈論明代北方邊防內移及影響〉，《新亞學報》，13(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1980)，頁 363-409。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頁 1-22。尤淑君，〈北平行都司的設置、內徙及其影響〉，《政大史粹》，20(臺北：政大歷史系，2011)，頁 1-39。

⁵ 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的反思〉，《河北學刊》，1986：2(石家莊：河北學刊雜誌社，1986)，頁 28。其後，有學者採用並沿襲了他的這種論點，參見景愛，〈平地松林的變遷與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沙漠化〉，頁 33。

⁶ 邱仲麟，〈明代燒荒考——兼及其生態影響〉，《臺大歷史學報》，3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6)，頁 25-63。

而由於漠南地區人煙稀少，森林的破壞遠不如漢人所控制的地面嚴重，故明代資料多言塞外多森林。如開平衛以北多古松，「號曰千里松林」；⁷大寧衛東南的七金山，「中多長松，一望鬱然，北人皆畜牧於此，衛境之大山也」。⁸另外，順天府密雲縣塞外的霧靈山，「草木暢茂，群虜巢之久」。⁹宣府鎮邊外，森林亦相當茂密。嘉靖中葉，蘇志皋奉命分守直隸口北道，駐紮宣府鎮城，常與總兵率軍出塞，「親見園林之盛，蓊鬱蔥蒨，柯葉交蔭」。¹⁰嘉靖中葉，宣府東北塞外「亂山叢樹」中，分布著「朵顏支部」。¹¹宣府人馮寶曾說：「獨石東南有李家庄，庄北有萬松溝，溝有朵顏花當部落寨，萬松森鬱，不可進溝」。宣府總兵雲冒亦提到：「獨石李家庄東，有朵顏寨，寨在山間，險不可攻，每盜馬北虜，恒經獨石邊下，墩軍欲舉火，則以牛羊為賂，去皆步行，有乘牛者，返則驅馬而歸，北虜追入其地，地皆大林，朵顏伏於林中射之，北虜不敢進。」雲冒所謂的「大林」，即為萬松溝。¹²萬曆年間，楊時寧(1537-1609)《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記載：宣府鎮渡口堡邊牆外，沿邊之牛心、大尖等山，「林木稠密，從來虜無由此入犯者」（參見圖二）；長伸地堡迤東一百五十里，則是「林木深阻，偵探最難」（參見圖三）；宣府鎮葛峪堡邊外之松樹嘴，附近山上亦多松樹林（參見圖四）。¹³至於大同鎮，據韓邦奇(1479-1555)記載：大同邊外之威寧海子，「水草肥美，林木茂盛，北虜珍倚之，羣聚於此，數為大同患」。¹⁴《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也記載大同鎮破胡堡邊外有大松樹山。¹⁵而蕭大亨(1532-1612)在《北虜風俗》說：蒙古地界「腴田沃壤，千里鬱蒼，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不似我

⁷ 顧炎武(清)撰，譚其驤等點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大寧都指揮使司·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頁 788。

⁸ 顧祖禹(清)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記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18，〈直隸九·附見·大寧衛·七金山〉，頁 840。

⁹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44，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條，頁 3354。

¹⁰ 岷峨老人(明)，《譯語》，收入沈節甫(明)輯，《紀錄彙編》（臺北：民智出版社，1965），卷 161，頁 1640。

¹¹ 翁萬達(明)撰，朱仲玉、吳奎信校點，《翁萬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7，〈聲息疏〉，頁 210。

¹² 楊守謙(明)，《大寧考》（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 162、163。

¹³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臺北：正中書局，1981），〈宣府鎮〉，頁 62、109-110、131。

¹⁴ 韓邦奇(明)，《苑洛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一年刊本），卷 19，〈見聞考隨錄〉，頁 17a。

¹⁵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大同鎮〉，頁 342。

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毛」。¹⁶

筆者並不否認明代軍民曾在塞外砍伐木材，但說明朝「毀滅」塞外的森林則太沉重，要討論明朝在塞外森林變遷中的角色，必須依據史料仔細檢證，而關於這一問題，歷來缺乏詳細的考察，即使有學者述及此事，所舉史料亦相當有限，推論的成分居多。基於此，筆者搜集零散的記載，分析出邊砍伐的行為類型，討論其持續擴大的過程。塞外森林植被的破壞，除了明朝軍民之外，蒙古部族也有部份責任，而對晚明邊境的漢蒙木市，學界已有若干討論，但主要以遼東為主，¹⁷在此擬加以補充，特別是薊鎮轄下許多關口的木市。

本文所論範圍，主要為環內蒙古的邊境一帶，至於遼東鎮開原以東的區域則不在討論之列。要說明的是，現存關於明朝軍民出邊採伐木材的記載，以遼東至山西之間的地域為多，受到資料偏向性的限制，以下所論自然無法具有全面性。

貳、燃料問題與出境採薪

明帝國為了防守蒙古等部族，在北邊的國防線上派駐了數十萬的軍隊。明初各鎮原額約近九十萬人，其後各有增損，至萬曆年間為六十八萬人。其中，薊鎮、保定鎮、山西鎮有所增加，其餘各鎮則均呈現減少之勢。¹⁸不可否認，這些鎮守在邊關的軍人，其生活所需的燃料，多半取之附近地面，特別是關內的山林。

而軍士竄出邊外就近採取，應該也是相當自然之事。在明代的北部邊境，就存

¹⁶ 蕭大亨(明)，《北虜風俗》(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耕獵〉，頁12。

¹⁷ 參見：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史淵》，90(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1963)，頁81-89；〈明末遼東の互市場補遺〉，《史淵》，100(1968)，頁157-167；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5), pp. 121-125. 杜婉言，〈明代木市初議〉，《社會科學戰線》，1985:2(長春市：吉林省社會科學院，1985)，頁146-147。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頁333。白鳳歧，〈淺談明清時期遼寧蒙古族的經濟〉，《滿族研究》，1991:4(瀋陽市：遼寧省民族研究所，1991)，頁87-88。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5)，頁57；〈明代馬市市場考〉，《民族研究》，1998:1(北京：民族研究雜誌社，1998)，頁65。特木勒，〈小歹青身世與義州木市〉，《民族研究》2010:4，頁90-93。

¹⁸ 吳晗，〈明代的軍兵〉，收入氏著《讀史劄記》(北京：三聯書店，1956)，頁103。

在著許許多多可以穿越的通道。永樂十四年(1416)五月，保安衛指揮司上奏：轄區內諸隘口可通車騎者有三，即深井、李家庄、大箭口；可通樵牧之小徑有八，即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坊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其中紙坊溝等處，又有可攀登翻越而過者，俱應分設兵士巡守。兵部議准：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防守。¹⁹這類能夠出界的小徑，在其它邊鎮上應該也都存在。

然而，百姓進出關口雖受到約束，但軍官役令士兵出邊砍柴卻屢屢見於記錄。兵士奉命出境採薪，往往冒著生命危險。宣德六年(1431)，行在都察院上奏：薊鎮開平衛都指揮唐銘，役使軍士出關採薪，軍士為蒙古所擄，雖然後來脫困跑回，仍應定唐銘私役之罪。宣宗曰：「邊將令軍士取薪芻，非大過，且所掠既歸，可宥之。」²⁰景泰三年(1455)，甘肅鎮莊浪守備魏榮令軍士出境採薪，致被蒙古兵射傷，又不趕緊追勦，陝西巡按史頤奏言應予逮問。朝廷降旨姑且寬恕，再犯不宥。²¹天順六年(1462)，宣府鎮西陽河堡守備楚禎，亦令軍士出境採薪，猝遇韃靼部眾，被殺死三人。事聞之後，朝廷命巡按御史鞠問，定楚禎罪當絞。都察院奏言：「禎令軍為蓄積計，較之私役者不侔」，乃降職二級，發往橫海差操。²²

成化七年(1471)，宣府鎮永寧衛鎮守中官莫海與分守參將陰傑，縱令軍人出境採薪，因而被蒙古兵擊殺。²³成化九年(1473)，薊鎮的撫寧衛亦有軍士三人潛出境外採薪，因蒙古人掩至而被殺。²⁴有鑑於軍人常須出境採集燃料，兵部在弘治七年(1494)奏請令各邊「每墩預採半月柴薪於內給用」，以免因出境採薪而為韃靼所掠。孝宗命亦准依所議施行。²⁵

¹⁹ 楊士奇(明)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80，永樂十四年五月壬寅，頁 1957。

²⁰ 楊士奇(明)等撰，《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84，宣德六年十月壬子條，頁 1935。

²¹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18，景泰三年七月庚申條，頁 4720。

²²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342，天順六年七月辛丑條，頁 6935。

²³ 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87，成化七年正月己亥條，頁 1700。

²⁴ 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卷 116，成化九年五月辛卯條，頁 2241。

²⁵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94，弘治七年十一月甲寅條，頁 1736。

明代邊兵之苦眾所周知，其出邊採薪的任務，除為應付闔營兵士炊爨之用外，同時亦為將領採辦所需。²⁶因此，軍士出邊採薪，在明代北邊各地此起彼落、不斷發生。隆慶四年(1570)十月，蒙古部酋打刺明安等沿膳房堡行獵，恰巧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亦至邊外樵蘇，遭逢其部眾，遂鳴砲迎戰，但寡不敵眾，被擄入敵營，帶往興和城，後來才放回數人。²⁷

隆慶五年(1571)，明帝國與俺答(1507-1582)正式展開互市之後，宣府以西邊境戰事大減，軍士出邊採薪更加頻繁。隆慶五年，延綏巡撫何東序(1531-1617)上奏就提到：「本鎮沿邊城堡密邇腥膻，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場」。²⁸事實上，官方雖有明文禁止出關之例，但出邊砍柴卻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即使兵部官員亦不諱言。萬曆六年(1578)正月，兵部侍郎項篤壽(1521-1586)題覆陝西巡撫董世彥(1526-?)奏言拏獲達賊姦細事，其中即云：「一面行各邊整兵隄防，一面嚴禁邊外樵採牧放，如民間所需，亦要懸木牌，定擬月日，辰出酉入」。項篤壽在覆奏的末尾還說：「宜通行陝西四鎮撫臣，著落大小將領，把守關隘，用心防範盤詰；其民間樵採懸牌出入，定擬時候，尤當嚴行查考」。奏上之後，奉聖旨：「這本說的是，依擬行，欽此！」²⁹由此可見，兵部實已默許此事，且令其在關口懸立木牌，規定月日與出入時間。陝西四鎮（延綏、固原、寧夏、甘肅）軍民出邊樵薪採木，自此亦有其依據。

在薊鎮方面，萬曆八年(1580)十二月，陳第(1541-1617)由潮河川關提調，陞為三屯車兵營遊擊將軍，奉命駐紮漢兒莊。萬曆十年(1582)十二月，被革任回籍。在這兩年之間，曾上〈出關採柴稟帖〉予薊遼總兵戚繼光(1528-1588)，其中談到：「本營不採柴，無以供爨，近蒙本府准令出龍井關採柴，百總、隊總執旗，率兵順次採取，相離只在五十步之內，即有警急，易于調集。出口、進口，俱魚貫不亂，火兵

²⁶ 戚繼光(明)撰，張德信校釋，《戚少保奏議》（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3，〈禁約樵採〉，頁101。

²⁷ 瞿九思(明)，《萬曆武功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35-36冊，卷8，〈中三邊·俺答列傳下〉，頁71。

²⁸ 何東序(明)，〈套虜輸款求貢疏套虜款貢〉，收入陳子龍(明)等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82，《何中丞九愚山房集》，頁4144。

²⁹ 項篤壽(明)，《小司馬奏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478冊，卷2，〈題為拏獲達賊姦細事〉，頁555-556。

做飯，以待眾兵。一用臨陣之法，有醉者一名不能挑柴，綁而示眾；有忽病者一名，以馬送回其家。」稟帖中又提到：「再照各邊開關，不許餘丁並出，以其孱弱，或為達虜擒拏，為地方累，故嚴禁之。卑職自為提調，每竊嘆息，以為餘丁皆軍之父兄子弟，軍既採柴以交官，而父兄子弟復不得採柴以自利，無怪乎貧日甚而逃日眾也！與其禁之甚嚴，熟若處之有法。」龍井關開關，漢兒莊營餘丁五百餘人皆欲隨行，松棚路李遊擊禁令不許出關。他於是寫信送去，信中說道：

老幼不許出關，此實憂深慮遠，地方可以無虞。但本營老幼，比老營不同，無一寸田地，徒藉開關採拾一柴一草度日耳。僕今為之分派，左部老幼即跟左部之後，右部老幼即跟右部之後，前後部皆如此，則堂堂正正之陣在前，而父兄子弟之親在後，萬萬可以無虞。凡係本營老幼，俱以紅布縫於衣領為記。倘有失事，僕任其責。

因此，漢兒莊營餘丁獨許出關，「每日得柴五百餘擔，此中價值頗高，是日得十餘金也。上不損公幣，下可利私家，真所謂不費之惠。」³⁰這個特例後來似乎變成常例，萬曆十三年(1585)，薊遼總督王一鶚(1534-1591)劾奏大水峪提調董應選，就談到「軍餘趙合等成羣出境樵採」。³¹

為了解決邊軍燃料不足的問題，萬曆十三年十月，直隸巡按蘇鄭奏請「寬關禁以開邊利」，內言：「關外草木蓊鬱，禁不敢取，宜每月許出關六日，先採三日，納充公費，後採三日，與各軍資贍。」奏疏上了之後，朝廷令總督、巡撫酌議。³²薊遼總督王一鶚在順天巡撫蹇達(1542-1608)、薊鎮總兵張臣、副總兵李如柏(1553-1620)及密雲兵備道郭四維(1533-1602)等逐一查議之後，於萬曆十四年(1586)八月二十一日覆奏：

³⁰ 陳第(明)，《一齋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刊本)，《薊門兵事》，卷上，〈勵士類〉，頁79a-80a。

³¹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85)，第6-7冊，卷1，〈參貪肆坐營提調疏〉，頁92。

³²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167，萬曆十三年十月戊辰條，頁3023。

臣等看得薊鎮切近邊關，兵馬雲集，柴薪如桂，內地貧軍經年糧餉幾何，所賴以助不給者，樵採於口外也。自關禁之後，一無所望，饑寒切身，漸至逃移。……今議明開關禁，步兵結伍，聯隊而行，馬兵架梁，防護而出，距邊三、四十里外，堂堂採取，則零星鼠竊之夷，將聞風遠避，又安敢逞撲捉之故智哉？誠如關臣所謂一舉而三利者。及查得每月開關六日，三日公費，三日給軍，固有定序，倘遇邊報多警，防禦正殷，則難拘以常期。合無當兩防之時，不必限以每月，預差哨夜出口偵探，果無大慮結聚消息，督軍連採，即多則旬日，少則四、五日，未為不可。撤防之時，照議每月六日，總計所採之數，半充公費，半給各軍。仍嚴禁官目不許尅減，敢有擅出私採者，即治以軍法。³³

由此可見，王一鶚、蹇達、張臣、李如柏及郭四維等人，對這一的提議深表贊同，畢竟這是解決邊區軍民燃料問題的重要關鍵。但在春秋兩季防務吃緊之時，他們認為不應限制每月六天，而需視情況彈性出邊，連續砍伐數日，能採多少即採多少；在春防、秋防撤防後，則按每月六日實施。奏疏上呈後，朝廷命依議施行。³⁴從此以後，宣府以西邊關軍民，每月得以出關採樵伐木數日，燃料問題稍微得到解決。

但有官員擔心縱放軍民出邊樵採容易啟釁。萬曆中葉，楊時寧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就說：宣府鎮靖胡堡邊外，有安免等部落在黑牛山、亂泉寺、許家衝等處駐牧，「遠偵探以察虜情，革樵採以杜釁端，尤當昕夕戒慎」。³⁵萬曆三十四年(1606)二月，在董家口邊外住牧的屬夷馬塔塔部落達子三十餘騎，就趁明軍出口採柴之際展開突襲，殺死軍士八名，擄去軍士二十一名。³⁶

天啟七年(1627)，駐牧在遼東、薊鎮邊外的插漢兒部虎墩兔憨（即林丹庫圖克圖汗，1592-1634），突然西徙攻擊哈刺慎、順義王諸部，宣府至寧夏一帶戰事再起。

³³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卷5，〈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頁572-574。

³⁴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177，萬曆十四年八月庚寅條，頁3290。

³⁵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168。

³⁶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418，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壬子條，頁7899。

崇禎五年(1532)，皇太極(1592-1643)又派兵追擊插漢兒部。因此，從遼東、薊鎮到宣府、大同，甚至是延綏、寧夏等地邊警時聞，准許邊軍定時出邊採柴的政策隨之發生變化。崇禎十年(1637)，宣大山西總督盧象昇(1600-1639)奏言：「臣竊見宣、大、山西各邊，一牆之外，樹木陰蔭，草薪茂密。而牆以內，則童山赭土，一望平沙，束草三分，擔柴百錢，如此其貴也。昨冬日出居庸關，即詢之宣鎮沿邊軍民，何不出口樵採？曰有禁。再詢之邊堡將備，何不出口樵採？曰有禁。」他在接任宣大總督，抵達駐所陽和堡之後，見總督衙門內設有「樵採木牌」，令軍士出邊砍柴，「其來舊矣」。往昔標營將士與附近居民，每月出口數次，「皆負薪曳木以歸，地方稱便焉」。蒞任宣府者考慮到軍民出口或有違犯法條，也曾加以示禁，但「未奉明旨」，至崇禎七、八年(1634-1635)朝廷才嚴禁。但禁止出邊採伐，終究不是辦法。且陽和堡新增標兵五千，苦於無棲止之所，建造營房千間，估計需要大小木材二、三萬根，若皆在口外採取，經月即可辦成，也可省下公帑二千餘兩。何況邊堡貧窮軍丁，每月出口四、五次，所得薪木即使僅值銀二、三錢，便可以養活性命。他認為准許出口樵採之便有五：「資貧乏之生，一也；壯軍民之膽，二也；城堡修築，就近取材，不糜公帑，三也；出口人多，可佐哨丁之所不及，四也；使邊外無長林豐草到處為人駐牧之場，五也。」其事雖小，關係邊關頗大，故上章稟明，乞請恢復舊制。³⁷結果如何，待考。

參、營建工事與界外伐木

森林做為一個可以滯礙騎兵的戰略物資，在明代邊區一向不准私自砍伐。成化十一年(1475)，延綏巡撫余子俊(1429-1489)就曾下令：「邊牆以裏、以外附近，不礙瞭望，不拘松栢、榆柳、圪蘭、背當、木瓜諸雜林木，并酸刺、棘刺、寧條諸雜叢窠，俱要嚴令守瞭崖砦之人，用心愛護，以拒賊馬。敢有擅自砍伐者，治以重罪，

³⁷ 盧象昇(明)，《盧象昇疏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本，1984），卷8，〈請停禁止樵採疏〉，頁202-203。

罰令補栽。原無者，不在此限。」³⁸反之，若影響到瞭望，則官員還是建議伐去。嘉靖初年，兵部侍郎胡世寧(1469-1530)提到：「先年禁伐近邊樹木，以制胡馬之衝突，不為無見，惟遼東各邊達賊，止是全進搶擄，多被藏伏樹林內，苦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39

正統以後，基於外族不斷侵擾，明帝國陸續在九邊修築了不同材質的邊牆（如砌磚、壘石或夯土）。⁴⁰其中，遼東方面，因三衛叛服無常，正統初年王翱(1384-1467)提督遼東軍務，遂修築山海關至開原的邊牆。成化初年，建州女真屢次犯邊，因巡撫李秉(1408-1489)建議，又修築開原經撫順到鳳凰山達鴨綠江的邊牆——自開原至鹹場，「或用石，或用土築之」；自鹹場至鴨綠江口，則「燔壁以築」。其後，邊牆多有坍塌，故在弘治年間，巡撫張鼎(?-1510)又重修山海關迄開原、遼陽之邊牆，總計千餘里。但自正德迄嘉靖年間，仍有不斷修補之記載。⁴¹延綏鎮東自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長達一千七百七十里的邊牆，係成化十年(1474)巡撫余子俊所修，但後來陸續有所修繕。⁴²寧夏鎮黃河東西兩路邊牆，亦成化年間由巡撫賈俊(1428-1495)始修，嘉靖初年陝西三邊總督王瓊(1459-1532)再修。⁴³甘肅鎮東自莊浪起，西至嘉峪關止，總長二千六百七十八里的邊牆，則是在西北三邊總制

³⁸ 余子俊(明)，〈余肅敏公經略公牘〉，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10），第17冊，頁515。

³⁹ 胡世寧(明)，〈為陳言邊務情弊疏〉，收入《明經世文編》，卷134，《胡端敏公奏疏》，頁1334。

⁴⁰ 相關研究，參見：李漱芳，〈明代邊牆沿革史略〉，《禹貢半月刊》，5:1（北平：禹貢學會，1936），頁3-17。吳錫華，〈論明代邊防內移與長城修築〉，《東海大學歷史學報》，4（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1981），頁25-47；〈論明代築萬里長城守邊的失策〉，《東海大學歷史學報》5（1982），頁13-36。陳正祥，〈長城和大運河〉，《中國文化地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頁163-171。華夏子，〈明長城考實〉（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2-164。阪倉篤秀，〈長城の中國史〉（東京：講談社，2004），頁57-200。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288-324。

⁴¹ 吳錫華，〈論明代邊防內移與長城修築〉，頁27-36。另參見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38-41。

⁴² 吳錫華，〈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臺北：亞洲歷史學家協會編輯委員會，1963），頁113-123；〈明代西北邊患與榆林的發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275-295。艾衡，〈明代陝西四鎮長城〉（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20-35。松本隆晴著，南炳文譯，〈試論余子俊修築的萬里長城〉，《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4:1，頁38-56。

⁴³ 艾衡，〈明代陝西四鎮長城〉，頁63-89。

秦紘(1425-1505)督飭下，於弘治十六年(1503)完成。固原鎮一千四百里的邊牆，也是在其任內興築完成。山西鎮偏關等處邊牆三百九十餘里，係嘉靖中葉山西等處總督翟鵬(1481-1545)所修。宣府、大同兩鎮邊牆八百里，則是接替翟鵬的總督翁萬達(1498-1552)所修。獨石口經居庸關至山海關的薊鎮長城，亦修於嘉靖年間，隆慶年間戚繼光鎮守薊鎮又加以重修，綿延二千里。⁴⁴（參見圖五至七）經過學者重新計算，明代邊牆東起遼東鎮鴨綠江口，西至甘肅鎮嘉峪關，全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里，約五千七百八十八公里。⁴⁵明代中後期，北邊國防線內的森林，由於軍民謀利、修築邊牆等因素，遭受到嚴重砍伐，其覆蓋率已大為降低。⁴⁶而在持續不斷修築的過程中，兵士在境外採取林木運用，可能也是存在的事實，只是現存記載相當少見。

嘉靖二十年(1541)，薊遼總督胡守中(1507-1546)為重修喜峰口的來遠、鎮夷二樓，亦曾砍伐邊外樹木。據記載，其修樓的緣由為：「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故有來遠樓一座，上可容萬人，水冲未葺，各夷過之，曰一樓尚不能修，豈能調兵伐我？」胡守中於是加以修葺，以便各夷冬天入貢時，「以身臨邊，召集樓下，宣諭威德」。⁴⁷據張袞(1487-1564)〈送總督薊州軍務少司馬文江胡公還京序〉云：胡守中命人「採木於塞，伐石於山，陶甃於工，皆天地自然之利，不煩內帑，三越月而告訖」；來遠、鎮夷二樓，聳立於喜峰口、潮河川之上，樓上可坐萬人，下可豎十丈之旗，「雄峙天漢」。⁴⁸十一月，守中奏報喜峯口、潮河川修城建樓竣工，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餘，「俱遠出邊塞採取木石修完」。世宗頗不高興，認為「守中假以修建冒費帑銀，擅自科罰軍衛官員，擾斂百姓，賄賂狼藉；又將邊關百年以來所蓄林木，

⁴⁴ 吳緝華，〈論明代邊防內移與長城修築〉，頁 40-43。

⁴⁵ 景愛，〈中國長城史〉，頁 323-324。

⁴⁶ 參見：于希賢，〈北京地區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壞過程及其後果〉，《環境變遷研究》，第 1 輯（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頁 106-109。暴鴻昌、景戎華，〈明清濫伐森林對生態的破壞〉，《平準學刊》，第 3 輯（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上冊，頁 146-147、151-154。暴鴻昌，〈明代長城區域的森林採伐與禁伐〉，《學術交流》，1991:3（哈爾濱：學術交流雜誌社，1991），頁 123-125。尹鈞科，〈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植被的破壞〉，《歷史地理》第 19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260-262、265-267。邱仲麟，〈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明代研究》，8（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5），頁 1-49。

⁴⁷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253，嘉靖二十年九月甲辰條，頁 5088。

⁴⁸ 張袞(明)，〈張水南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9），集部第 76 冊，卷 4，〈送總督薊州軍務少司馬文江胡公還京序〉，頁 607。

擅行砍伐，自撤藩籬，壞事殊甚。」於是令御史段承恩、翁五倫火速前往查勘奏聞。⁴⁹十二月，詔命錦衣衛請往拘押胡守中，命法司詰問。逮至後，刑部尚書吳山、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毛伯溫(1482-1545)、大理寺少卿虞守愚(1483-1569)等會審，審問後上奏：「守中本以反覆小人，貪殘賊吏，假藉寵靈，擅作威福，蠹政欺君，虛張虜勢，假稱犒賞，冒費帑銀至鉅萬，罪已不赦。至于修建來遠樓，砍伐潮河川一帶林木，自撤藩籬，寘之極典，尚有餘辜。宜依盜沿邊錢糧二百兩以上例，論斬梟示。」⁵⁰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胡守中就以此被斬。⁵¹

關於胡守中砍伐境外森林的原因，若干記載與《實錄》有異。據沈良才奏疏指出：「夫足食足兵，安邊至計也，未聞有築樓以禦□者。守中妄行奏請，大啟工役，當隆冬沍寒之時，驅軍民胼胝之役，督責嚴苛，哭聲載道」；又云：「沿邊一帶，先年栽植林木，茂密盤拱，□騎不得長驅，邊民倚為障蔽。守中乃以瞭望不見為辭，盡行剪伐」。⁵²值得注意的是，這則記載提到所砍的樹木並非古松，而係明帝國舊時所栽種者。另外，陳建(1497-1567)《皇明通紀集要》亦記其「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⁵³范守己的《皇明肅皇外史》所載類似：「出塞伐古松數萬株，自以為去蔽翳，虜不得潛伏其間，實自撤其藩籬也」。⁵⁴呂坤(1536-1618)則云：「兵部侍郎胡守中總督薊州，曾伐邊樹作望敵樓，為給事中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⁵⁵

至於胡守中砍伐松樹的數字，除以上所言「數萬株」外，還有其它不同記載，如《國朝獻徵錄》所錄佚名撰〈胡守中傳〉云：「先是舊植樹隘口，制胡騎奔突，久則合抱矣。守中下令聽斬伐，凡五十餘萬，悉貨之。」⁵⁶數字最為誇張的，則屬

⁴⁹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255，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條，頁 5120。

⁵⁰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256，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庚辰條，頁 5143。

⁵¹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316，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甲午條，頁 5906。

⁵² 沈良才(明)，《沈大司馬鳳岡先生奏議》（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卷 1，〈備述大臣奸貪實跡懇乞聖明嚴加究治以正國法疏〉，頁 4b-5a。

⁵³ 陳建(明)，《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卷 30，頁 336。

⁵⁴ 范守己(明)，《皇明肅皇外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2 冊，卷 21，頁 162。

⁵⁵ 呂坤撰(明)，王國軒、王秀梅整理，《呂坤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去偽齋文集》卷 1，〈摘陳邊計民艱疏〉，頁 40。

⁵⁶ 焦竑輯(明)，《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00-106 冊，卷 40，〈胡守中傳〉，頁 168。

鄭曉(1499-1566)《吾學編》的記載：薊鎮「山麓林莽，樊樹阻固，以供薪炭、伐條枚，日就疏薄。嘉靖中，胡守中又出塞盡斬遼金以來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⁵⁷有趣的是，方孔炤(1590-1655)在《全邊略記》〈薊門略〉正文說：「時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被特簡受事，則伐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卷末按語則云：「權幸者斬遼金來松林百萬殆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⁵⁸一說「數萬株」，一說「百萬」，前後顯然互相矛盾。實際上，修建兩棟接待外族的高樓，不需要砍伐幾十萬株或百萬株松樹，而且砍伐如此大量的松樹也非常容易，《皇明通紀集要》、《皇明肅皇外史》所記之「數萬株」應該比較可信。且修建二樓的時間在冬季，砍伐較為不便，木材還必須放乾、再鋸成建材，似乎不太可能多到幾十萬株或百萬株。當然，如果是假藉修樓進行濫伐，先砍倒再慢慢運，其數字可能要多一些。

必須指出的是，明代軍方只要出兵境外，往往順便砍伐林木擡回關內。嘉靖年間，順天巡撫楊守謙曾說：「聞近年宣府守臣，於李家庄虜頗事捕殺以希功賞，且松樹多斬伐。」⁵⁹此事所指，乃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宣府總兵官邵永出塞襲擊李家莊朵顏別落之事。⁶⁰出塞攻伐順便伐木之事，亦見於遼東總兵李成梁(1526-1615)身上。隆慶六年(1572)春，李成梁率部出擊塞外，正月出鎮夷堡八十里，至皂洞山；二月出鎮邊堡六十里，至亂石山，「亡所得，得雜木數萬」。⁶¹

官方為修建儒學與文廟，亦嘗在邊外採木運用。如陝北神木縣城內的廟學，自正德十六年(1521)以後，廢而未修者約六十載。隆慶五年，張守中(?-1575)任神木道兵備才加以重修，「木取諸塞外，出永興堡而北百有五十餘里」；石材取自東山，丁役由鎮羌、府谷二城守軍提供，工程費取自贓罰銀，不足則由神木道贖銀襄助。工程始於隆慶六年二月十日，至八月底竣工。⁶²

明代中後期，係邊牆修築的高峰期，薊鎮官軍為修築邊牆及其它工事，常常出

⁵⁷ 鄭曉(明)，《吾學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12冊，《地理述》，卷下，〈薊州〉，頁592。

⁵⁸ 方孔炤(明)，《全邊略記》(臺北：廣文書局，1974)，卷1，〈薊門略〉，頁53、150。

⁵⁹ 楊守謙(明)，《大寧考》，頁162。

⁶⁰ 嚴從簡(明)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23，〈北狄〉，頁729。

⁶¹ 瞿九思(明)，《萬曆武功錄》，卷12，〈東三邊·速把亥列傳〉，頁212-213。

⁶² 張四維(明)，《條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51冊，卷24，〈神木縣重建學廟記〉，頁658。

境採木，甚至被蒙古兵所殺。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牆子嶺官軍以築牆採木，為屬夷所撲殺，經過御史陳省等劾奏，世宗降旨降參將戴恩一級，指揮張永祚等下獄，由御史讞問。⁶³另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順天巡撫耿隨卿〈勘邊工疏〉提到：

天壽山、沙嶺口、黃花路、石城峪、居庸路、灰嶺、德勝、錐石、賢莊、門家峪等口通應設備，但禁山草木不敢折伐，合用榨木須於隔遠渤海所等處口外採辦。⁶⁴

至八月上旬，禁山的榨木安設完成，耿隨卿與昌平總兵劉漢等各題揭上報：「禁山灰嶺等口安設榨木扣石俱已完備，及稱前項各口漸通人行，仍要遵照先年題奉欽依事理，備行提督太監、總兵、兵備等官巡視盤詰，不許軍民人等私竊出入；其白龍潭、荒砲兒等處，雖公差、哨夜亦不許擅自經由」。⁶⁵而在完工之前的七月二十六日，防守古北口路曹家寨的延綏遊擊高如桂營下軍士，於巳時出黑谷關外砍伐榨木，至未時時分，突遇步行蒙古兵五十餘人名，在邊境外埋伏，因此兩相戰鬥，明軍被射傷五名，蒙古兵亦損傷數名。⁶⁶

邊鎮為了修築邊牆，對附近森林帶來不小的影響。隆慶三年(1569)，總理九邊屯政都御史龐尚鵬(1524-1581)曾說：薊鎮、昌平二鎮原本茂密的山林，自嘉靖二十年間，「沿邊諸臣以營繕之故，輒伐木取材」，「積習相仍，遂弛厲禁，燒柴為炭，折枝為薪，無復顧忌」，迄至隆慶初年更加嚴重，「或伐木徧搜於絕嶠，以給脩邊之工；或採薪貿易於通衢，以供撫夷之費」，不斷砍伐的結果是，「萌孽殆盡，幾於濯濯」。故他建議行文督撫衙門，通令守備、總兵、參將等官各照駐紮地面，「凡邊牆之外，山崖空曠去處」，廣種榆柳棗柿之類樹木，「彼此聯絡，各橫闊十餘里」。每

⁶³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533，嘉靖四十三年四月辛丑條，頁 8676。

⁶⁴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10 冊，卷 7，〈制疏考·薊鎮制疏·題奏〉，頁 364。

⁶⁵ 楊博(明)，《楊襄毅公本兵疏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61 冊，卷 19，〈覆巡撫順天都御史耿隨卿等防守陵山徑路疏〉，頁 698。

⁶⁶ 楊博(明)，《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 20，〈覆順天巡按鮑承蔭等參薊鎮隱匿夷情疏〉，頁 712。

年以種樹之多寡，做為邊功之優劣，巡關御史即委派官員查驗，分別好壞加以獎懲。並嚴行禁約，不准隨便砍伐。數年之後，「千里成林，而虜人絕南牧之路矣」。⁶⁷由此推測，邊牆以外約一、二十里，森林似乎被砍去不少。

隆慶三年，薊鎮總兵戚繼光(1528-1588)建議修築敵臺，工程之進行，人力借助班軍，而以南兵為隊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⁶⁸出境採木之時，須提防屬夷突襲，故戚繼光云：「今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疏彼，竟當有失」。⁶⁹七月間，薊鎮建昌營中軍袁勛、千總余忠裕等督三千餘軍士，出冷口採木修邊牆，行軍至長嶺溝，遇牧民二百餘騎，「捉軍挾賞」，袁勛等與其交戰，軍士六人受傷。⁷⁰隆慶四年四月，薊鎮馬蘭谷守軍傳報，外族在關外二十三里，撲捉偵卒及為築敵臺採木的軍士十餘名。⁷¹

隆慶四年，明帝國與俺答達成和議，彼此關係趨於和緩，雙方在萬曆五年(1577)又重訂規矩，其中一條云：「各城堡採打木植者，或上一百出口者，許守口夷人引領，採打回邊完日，賞段二疋、梭布八疋」。⁷²此後，宣府以西各鎮，軍士至界外採木，有關外的牧民帶領。同年，兵部尚書王崇古(1515-1588)因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工科都給事中劉鉉論劾，具疏奏明封貢本末，其中談到：

\

今經七載，節省國餉，奚啻百萬；保全軍民，不可數紀；開墾屯田，遠至邊外；修砌城堡，各用磚包，築建邊垣各數百里，柴、磚、木料咸取虜中。昔也各邊斗米值銀二、三錢，今則僅值錢許。⁷³

王崇古此處所述修邊牆取柴木於邊外，係屬宣府、大同以西的情況。實際上，為修

⁶⁷ 龐尚鵬(明)，《百可亭摘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29冊，卷2，〈酌陳備邊末議以廣屯種疏〉，頁145-146。

⁶⁸ 汪道昆(明)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59，〈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頁1233。

⁶⁹ 戚繼光(明)，《戚少保奏議》，卷3，〈陳夷情〉，頁105。

⁷⁰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卷11，〈紀部·隆萬經略〉，頁356-357。

⁷¹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11，〈紀部·隆萬經略〉，頁357。

⁷² 王士琦(明)，《三雲籌俎考》（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8），卷2，〈封貢考〉，頁250。

⁷³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67，萬曆五年九月戊辰條，頁1467。

邊牆而出邊採木，對邊軍是一大負擔。萬曆六年(1578)，兵科給事中王致祥奏邊防八事，談到修築邊牆時曾說：「其採薪木也，工程浩鉅，強者負擔而趨，弱者稱貸益之。其入山、出口也，道里阻修，強者依期而至，弱者又不能也。」⁷⁴

而在薊鎮、遼東邊區，因與土蠻（插漢部）仍處於對峙狀態，「屬夷」又反覆無常，出關伐木若無較多兵力，可能遭到襲擊。萬曆九年至十年間，陳第駐守薊鎮的漢兒莊，因朵顏部酋兀魯思罕之婦伯彥主喇（或名伯顏主賴）、張兔等在喜峯口住牧，為先聲奪人，假借出關採木之名，「寓揚兵之實」，派兵士一千名行軍出境，「出關旗幟鮮明，隊伍嚴密」。伯彥主喇大驚，派使者來問：「是何處兵？來幹何事？」陳第命通事回覆：「是漢莊營兵，來採木板耳。」使者又來問：「各營採板之兵，俱零星而行。今有隊伍，而又有旗號，不知欲何為乎？」通事回答：「本營規矩，原是如此，爾等勿懼，實來採板也。」伯彥主喇、張兔等乃派遣數名騎兵遠距離隨行，直至登山而止。於是隨便砍了幾塊木板，撤兵入關。⁷⁵由此可見，在此之前，軍士出邊伐木，人數較為零星，與陳第此次的行軍方式不同。

如果防護的兵力不具優勢，一旦被外族襲擊，往往損失慘重。萬曆二十年(1592)三月，遼東錦州軍士出邊採木，就遭到埋伏的「達賊」（插漢部）追擊，遊擊栢朝翠聞警，疾馳出塞救援，中箭而死，官軍被殺三百餘人。⁷⁶但軍方為了修建工事，又不得不出境採木，故萬曆四十四年(1616)，薊遼總督薛三才(1555-1619)曾說：「邊工喫緊，全在採辦。必採柴然後可以燒磚辦灰，必出口然後可以採柴，陳兵而防，結隊而出，猶虞不測」。⁷⁷可見為修築邊牆，勢不得不出邊砍伐，而這當中又充滿變數。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奴兒哈赤(1559-1626)舉兵，稱後金國汗，以七大恨告天，利用互市交易，明軍戰備鬆懈之時，裏應外合，攻下撫順。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開原亦失陷。天啟元年三月，瀋陽、遼陽接著淪陷。天啟二年(1622)正月，

⁷⁴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71，萬曆六年正月甲戌條，頁 1533。

⁷⁵ 陳第(明)，《一齋集·薊門兵事》，卷下，〈慮敵類·揚兵關外稟帖〉，頁 24a-25a。

⁷⁶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246，萬曆二十年三月庚辰條，頁 4586。

⁷⁷ 薛三才(明)，《薛恭敏公奏疏》（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 7，〈議山東班軍照舊赴防疏〉，頁 369。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548，萬曆四十四年八月癸丑條，頁 10296。

平西堡戰敗，遼東巡撫王化貞(?-1632)棄守廣寧，率部逃入山海關內，奴兒哈赤不戰而得廣寧，遼東局勢更為不堪。七月間，兵部建議以百萬金錢修築寧遠城，⁷⁸遼東經畧王在晉(1564-1643)上〈辨寧遠築城疏〉說到：

凡邊外興工、打草、斫木，必先架梁。架梁者何？先領馬兵擺列，以防奄至之寇也。此在八里舖且然，而況于去關三百里之外乎？寧遠架防，必須精壯馬兵三萬，做工一日，則擺設一日，虜至即鬪，鬪必勝而後可保軍夫之命。再加做工軍夫萬人，則四萬矣。四萬人之食何從致，三萬之馬何從買，馬料何從辦，居舍何從構？……築城必先造磚、燒灰，磚灰必先開窑，開窑必須打柴、鑿石，打柴、鑿石必入叢林深谷，跼足犬戎之域，委身豺狼之鄉，地遠勢孤，力疲膽怯，此辦料之難也。⁷⁹

王在晉這份奏疏，詳細列舉築城的種種困難，如出邊採木必須擺兵防護等等，這當中充滿莫測的危險性。天啟二年(1622)九月初，督師大學士孫承宗(1563-1638)抵山海關視師，即會同遼東巡撫閻鳴泰(1573-?)，責令遼東總兵江應詔定兵制，令山海監軍副使袁崇煥(1584-1630)修營房，令戴罪立功撫夷總兵李秉誠教火器，令廣寧兵備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令兵部司務孫元化(1581-1632)勘查北山、南海形勢布設奇兵，令中右所遊擊祖天壽（祖大壽 ?-1656）給覺華島新歸之遼民糧餉與器械。而孫承宗之所以令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原因在於「木必藉于虜產」，萬有孚久任廣寧兵備道，專責撫賞插漢兒各部落，故可藉此「使督採木」之事。⁸⁰孫承宗「募守邊夷人採木」的做法，免除了王在晉所談到的危險性，不失為一個變通的好辦法。

不久，又有修三道關至海邊的邊牆之事。天啟三年(1623)，茅元儀(1594-1640)

⁷⁸ 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4，天啟二年七月甲寅條，頁 1213。

⁷⁹ 王在晉(明)編，《三朝遼事實錄》（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卷 10，頁 1158-1160。

⁸⁰ 茅元儀(明)，《督師紀略》，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6 冊，卷 2，頁 329-330。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26，天啟二年九月丁未條，頁 1316。

〈遼東邊牆工費議〉曾經估計：邊牆計長三千五百丈，磚窑大小不等，一窑約燒六千塊，總計九百一十九萬二千塊，則需一千五百三十二窑。每窑約用柴一萬二千觔，打柴者每一工，近者可百觔，遠者半之，平均折算約七十五觔。濕柴七十五觔，約可得乾柴五十觔。則柴一萬二千觔，當用折柴二百四十工。一千五百三十二窑，當用打柴者三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工。以三千人打柴，則所需之柴，約一百二十二日有餘可以備齊。⁸¹從這一串數字，不難看出修築邊牆消耗木材之鉅。而也就為了伐木修牆，中右所參將王楹率兵出境，竟以此而死。據《實錄》記載：天啟三年十一月，哈喇慎部朗素、貴英糾合三十六家要脅明帝國撫賞，否則進犯中右所，當時參將王楹適巡邊，路過仙靈寺，敵眾設伏四起，王楹遂被殺。⁸²茅元儀在《督師紀略》所述較為詳細，內云：「王楹所守中右，以城工未興愧於中，後乃日出採柴、採木，以為繕城計」。哈喇慎三十六家，以朗素專管封貢事，哈喇慎之巢穴正對喜峰口，在遼東原無撫賞，「近始有迎風等賞」。朗素稱其截堵東夷之功，欲添加賞額。是時，參將魯之甲兼管此部撫賞之事，堅持不給，朗素等遂不歡而去。廣寧兵備道萬有孚原主張此時不可出關，但王楹自認為應該與部卒一同出邊護採柴木，結果朗素之眾「伏從溝起」，王楹於是殉職。⁸³

肆、採柴砍板與彌補撫賞

明初以來，在蒙古本部（即所謂「大虜」、「北虜」或「達虜」）與明帝國邊界之間，有些遊牧部落（即所謂「屬夷」）歸附於明。其中，又以兀良哈三衛（朵顏、泰寧、福餘）最為有名。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明太祖於兀良哈之地，設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以居降胡」。⁸⁴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記載三衛設

⁸¹ 茅元儀(明)，《石民四十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9-110冊，卷52，〈遼東邊牆工費議〉，頁435。

⁸² 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卷41，天啟三年十一月甲戌條，頁2131。

⁸³ 茅元儀(明)，《督師紀略》，卷7，頁368。

⁸⁴ 李景隆(明)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

立之位置為：「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⁸⁵黃瑜《雙槐歲鈔》的記載略有不同：「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恆，部落以千計，而朵顏最強，……蓋外邊之地，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牧」。⁸⁶《雙槐歲鈔》此一記載中，朵顏的牧地有二，其為「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後為「西自密雲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或許前者是明前期的情況，後者則為明中期的駐地。

然而，兀良哈三衛順逆無常，也時常擾邊，如宣德三年(1428)正月，邊將上奏：「兀良哈之人，往往於灤河牧馬，請掩擊之。」宣宗曰：「虜犯邊，當正其罪，今未有犯，姑遣人諭之。」⁸⁷正統四年(1439)歲末，有兀良哈達子於遼東近邊狩獵，放火延燒明軍所立邊界木柵一千餘丈。⁸⁸正統五年(1440)三月，則有福餘衛韃靼人馬車輛，獵於遼東石峯口外，有四騎拆木柵入境，至靜安堡刺探軍情，而守軍並未發現。⁸⁹正統七年(1442)九月，永平總兵王彧(?-1447)等上奏：「兀良哈三衛，往往假以牧放、射獵為名，犯我邊境，今後遇有近邊者，欲便勦殺。」英宗勅命彧等曰：「三衛頭目亦有尊朝命、不為非者，豈容一槩勦殺。況田獵乃其衣食所關，卿等其念之。」

90

即使如此，明朝還是對三衛各大小部落加以撫賞。明中葉以後，隨著韃靼各部逐漸統一，對明朝邊防的壓力增加，兀良哈三衛藉此要脅（特別是最靠近明帝國的朵顏衛），邊軍將領為安撫部酋及取得軍事情報，不得不擡高撫賞的份額與成色，因此撫賞的開支日漸擴大，嘉靖年間更是越來越嚴重，在經費不足之餘，軍士成為待宰的羔羊。嘉靖二十九年(1550)，順天巡撫王汝孝奏稱：

月辛卯條，頁 2946。

⁸⁵ 鄧士龍(明)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 97，〈馬端肅公三記中·撫安東夷記〉，頁 1946。

⁸⁶ 黃瑜(明)撰，魏連科點校，《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5，〈朵顏三衛〉，頁 86。

⁸⁷ 楊士奇(明)等撰，《明宣宗實錄》，卷 35，宣德三年正月丁未條，頁 885-886。

⁸⁸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62，正統四年十二月丙戌條，頁 1184。

⁸⁹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65，正統五年三月庚申條，頁 1253。

⁹⁰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96，正統七年九月丁卯條，頁 1927。

照得朵顏三衛夷人，歲許入貢，撫賞之例，自來所有。先年求討者，止是數人，撫待不過鹽米。近年以來，醜類生齒漸繁，動以數百，叩關絡繹不絕，始以酒肉、桌面，繼增段疋、牛羊，一切取辦於軍丁、官旗，指一科十。⁹¹

嘉靖三十一年(1552)，順天巡撫吳嘉會〈請撫夷錢糧疏〉指出：喜峯口每年二次驗放夷人大賞，用銀三千八百銀兩；陸續撫賞，用銀二千二百四十餘兩。洪山口、龍井兒、董家口、榆木嶺，每年大賞一次，其他月份小賞，約用銀三千九百餘兩。另外，古北口約用銀三千四百餘兩，白馬關、石塘嶺約用銀一千三百餘兩，曹家寨所屬黑峪等關約用銀一千五百餘兩，牆子嶺、豬圈頭、將軍石約用銀一千五百二十兩，鮎魚石、黃崖口、寬佃谷、大安口、羅文峪約用銀三千九百五十餘兩，擦崖子、冷口、桃林口、青山口約用銀二千六百零七兩，平山營、界嶺口、義院口、大毛山約用銀四千九百餘兩。以上八區，每年總計用銀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七兩。在收入方面，山海關抽取商稅，自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來，收銀二千八百餘兩；景忠山香稅一年所收，不及二百餘兩。兩相扣抵，每年撫賞銀仍欠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七兩，先前奏請動支太倉銀兩，照數撥給支用，已經會議題請，但未回覆。故再次題請，乞請勅命兵部、戶部儘速議處，每年發給銀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七兩，解送薊州管糧郎中收貯，專備撫賞之用。⁹²五月間，明世宗同意發給太倉銀二萬五千兩有奇，用以撫賞朵顏三衛夷人，但下不為例。⁹³

嘉靖三十七年(1558)，薊遼總督王忬(1507-1560)再次奏請發給撫賞銀，並在奏疏中提到嚴禁各將領「科扣軍士月糧，并逼令打柴易賣入己」。⁹⁴十一月，兵部覆奏：「撫夷之費，請如郎中唐順之議，歲給銀三萬以充」。⁹⁵然而，朝廷雖答應撥給銀三萬兩，實際撥到的僅一萬兩。嘉靖四十年(1561)，薊遼保定總督楊選條陳地方極弊

⁹¹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7，〈制疏考·昌鎮制疏·題奏〉，頁359。

⁹²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7，〈制疏考·薊鎮制疏·題奏〉，頁284-285。

⁹³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385，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戊戌條，頁6798。

⁹⁴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7，〈制疏考·薊鎮制疏·題奏〉，頁289。

⁹⁵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466，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條，頁7860。

十五事，其中一事云：「近年議討撫夷之資，戶部給銀七千兩，兵部給銀三千兩，止充三分之一之用。賞薄不饜夷欲，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為所要挾，無以應之，乃至迫軍採柴、科斂軍需，以充其費。」⁹⁶嘉靖四十四年(1565)，直隸巡按梅惟和亦談到：「臣嘗巡歷邊關，見各口之撫賞，官銀不足則扣除月糧，月糧不足則以採薪繼之，軍士由此困窮日甚。」⁹⁷

隆慶元年(1567)，兵部議覆御史王友賢(?-1600)條陳邊務可行六事，文中指出：「朶顏三衛歲有撫賞，而承委者往往侵盜，致扣軍糧、採山木償之而猶不足」。⁹⁸由此看來，經費不足的原因，還包括承辦者的風紀問題。但為了撫賞屬夷，卻要派軍士出境伐木籌款，確實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同年，兵科給事中魏時亮(?-1585)在奏章提到：

臣等切惟屬夷之為邊患久矣，而邊鎮坐受撫夷之害亦已極矣。撫夷之費，將官每令屬夷引我軍士出邊，砍取邊外大木以入，然後將賣木之價，湊足撫夷之用。臣切慮不但邊木日盡，邊騎直衝，堂堂中國，資木價以撫夷，其體亦甚褻矣。⁹⁹

魏時亮在奏文中所談到的「令屬夷引我軍士出邊，砍取邊外大木以入」，然後變賣木材以充撫賞，即薊遼、保定總督譚綸(1520-1577)所謂的「採柴砍板撫賞成規」。此一名詞在其它資料未見，首次出現係在譚綸的奏疏中。隆慶三年，京中流言薊鎮總兵戚繼光為修邊牆，「斬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籬先徹」。¹⁰⁰譚綸為此上奏申辯，奏疏中談到其所用木料，均照「採柴砍板撫賞成規」，聽各

⁹⁶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501，嘉靖四十年九月乙巳條，頁 8288。並見楊選(明)，〈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疏〉，收入《明經世文編》，卷 196，《楊中丞奏疏》，頁 2014。

⁹⁷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 7，〈制疏考·薊鎮制疏·題奏〉，頁 299。

⁹⁸ 張居正(明)等撰，《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9，隆慶元年六月辛丑條，頁 256。

⁹⁹ 魏時亮(明)，〈題為聖明加意虜防恭陳大計一十八議疏〉，收入《明經世文編》，卷 371，《魏敬吾文集二》，頁 4013。

¹⁰⁰ 張居正(明)等撰，《明穆宗實錄》，卷 36，隆慶三年八月戊午條，頁 921。

路將領擇取屬夷一、二人做為人質，命夜不收「出邊外數十、百里燒荒之地採取」。他建請派員至邊關實際會勘「邊外樹木是否堪作藩籬？今所採臺木曾否以屬夷為質？出採數十、百里之外，於藩籬有無傷損？務要一一親身目擊，毋徒委官虛應故事。」¹⁰¹從譚綸的語氣，可見其對中傷者甚是憤怒。

據萬曆初年《四鎮三關誌》記載：「昔兀良哈效順，屏翰中國有功，自永樂初年，歲給賞賚，歷今不廢，亦藉以出哨、送哨。然種類益蕃，賚費視昔倍蓰。」以薊鎮為例，朝廷每年發給內帑二萬七千六百兩，而實際支出三萬八千兩，其不足之處，「取盈於軍士樵採」，用以買辦金衣、緞、布、豬、牛、羊、酒、米、鹽、鐵鍋、鐵鐮、桌席等物。舉行撫賞的關口有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桃林口、冷口、擦崖子、董家口、大喜峯口、龍井兒、洪山口、寬佃谷、大安口、黃崖口、將軍營、曹家砦、古北口、潮河川、白馬關、石塘嶺、牆子嶺。牆子嶺撫賞，嘉靖四十二年革罷，其後未恢復。總計撫賞關口一十九處，每年撫賞塞外部族共一百六十七起，總計二萬八千七百六十四名。撫賞之費用有限，而外族又不斷陳請，「於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採樵。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軍不勝苦，而逃且斃者有矣」。¹⁰²

明代後期，除了每月不定期令軍士越界樵採柴薪之外，還有一年兩度的集體性出關砍木行動。有關於這一成規，官書所言亦不詳，萬曆年間曹學佺(1574-1646)在〈遊薊門記〉所言則較細。曹氏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二月下旬，其友人張維誠同遊薊鎮，在二十一日與馬蘭峪主將王某會面，二十二日邊軍適有事出塞，曹、張兩人乃隨王某部眾前往。據所撰遊記云：

初出關，行草石間，多水，亦往往遇岡嶺。嶺上赤燒，隨風蔓延，忽在平地，忽在高峯，疾如過隙。磐山之巔，夜所望火龍掣空者，即此。蓋邊上無事，常閉關，只朔望啟小竇，放夜不收更番出入。此則為伐木之役，一歲可兩度云。

¹⁰¹ 譚綸(明)，《譚襄敏公奏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八年刊本），卷7，〈流言亂正搖動人心懇乞聖明遣官會勘敵臺以定國是以全忠計疏〉，頁29a-35a。

¹⁰²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6，〈經略考·薊鎮經略·今制〉，頁193-194。

夜不收者，人形而獸命者也。每出關半月，始得歸。去時夾帶麵食少許作行糧，刀一把、箭數枝，晝臥草間，不敢見形，夜出探虜。或射鳥鼠自給，歸則砍柴一束，可備晨炊而已。夜不收往往結識于熟夷，熟夷情甚狡，向背不一，互為我與虜之耳目，夜不收必探問其消息。然虜或犯，無不先告之者，夷以此要厚賞于我。我每年大放軍士伐木二次，以償其費。必四山盡燒，防有伏者。仍塞軍士于各口，帥始出。度口在百里遠近，而帥營在三四十里也。雖去虜尚遼闊，然已無一紙之隔。¹⁰³

由此看來，為了彌補撫賞費用之不足，當時有一年兩度出關大砍樹木之制。而這一制度的出現，可能與第一節所談到的萬曆十四年奏准出邊樵採的定例有關。曹學佺所遇上的這次出邊，乃是春防期間的出邊大砍；值得注意的是，砍伐前先行燒荒，以阻絕敵人來襲。但如果是小部伍出邊，防護兵力不足，則受到伏擊的可能較大。萬曆四十四年(1616)八月，薊鎮石塘關提調王臣，命軍士出關採木，為夷婦滿旦部落擄去二十餘人。總督薛三才於奏疏中言：「夫石塘一路，前此所加賞，歲取足於採辦者二千一百餘兩」。¹⁰⁴可見王臣做此決定，也是為了籌措撫賞的銀兩。

總之，撫賞經費不足的影響之一，是軍士必須為此到長城線外砍柴伐木。這種在邊區所形成的內規，至晚在嘉靖年間已經定型，甚至在更早之前既已存在。明代後期，每年大放軍士出關伐木兩次，係配合春防與秋防實施。天啟三年(1623)，順天巡撫岳和聲曾在奏疏中談到，薊鎮自籌撫賞採辦柴價銀兩，「向藉春秋兩防，班兵過堂，各樵採三日，變價收貯」，再「分發各路充賞，其來已久」。¹⁰⁵

¹⁰³ 曹學佺(明)，《石倉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67冊，卷3，〈遊薊門記〉，頁906。

¹⁰⁴ 薛三才(明)，《薛恭敏公奏疏》，卷6，〈勘明山後失事併陳滿旦停貢始末疏〉，頁317。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548，萬曆四十四年八月癸丑條，頁10384。

¹⁰⁵ 岳和聲(明)，《餐微子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1，〈虜賞溢額乞發部帑疏〉，頁147。

伍、其他動機：公益與私利

明代為管理北邊各關門禁，洪武年間修《大明律》時訂有相關條例，如：「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把守之人，知而故放者，同罪。」¹⁰⁶比較特別的是，由於明代中葉以降，建材的供應在邊區日益成為問題，有將領曾經護民出邊伐木。如成化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間(1480-1487)，李英(1444-1487)任分守錦州、義州右參將，有鑒於「錦、義民居久敝，乏材修葺」，於是「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為屋，雖寒暑切身，出入虜巢，不憚也」。¹⁰⁷李英的例子或許較為特殊，是派遣部隊出邊防範，讓百姓在安全的環境下伐木。但這樣做，卻是違法的。

弘治八年(1495)，有昌平縣百姓私出境外伐木，事發之後，朝廷逮問駐關昌平把總謝昂、黃花鎮守備于宣，罰俸兩月。出境伐木者，則被枷號示眾，再發往邊衛充軍。¹⁰⁸這樣的處置，完全依照《大明律》。原木的運輸較柴薪困難，從邊外運回關內，除非經由偏僻山嶺費力搬入，否則必定會被守關軍士察覺，而百姓敢於出境伐木，與軍士勾結的可能性相當大。

實際上，中央官員顧及的是原則性的法律，邊境軍民面對的卻是生計的困擾，不准出邊樵採和伐木，與柴薪和建材難以取得，實在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有些官員倒是願意站在百姓一邊來思考。正德十四年(1519)，姚鎮(1465-1538)巡撫榆林鎮，當時「鎮城之外，虜寇叵測，城門晝閉，禁民樵採」；姚鎮認為這是「自敝之道」，於是「列兵近邊，聽城中男婦芻牧，恣其力之所取，至暮嚴兵衛之而還。計一日所入，值千餘金」。邊民取得薪材之困難，賴此得以稍獲解決。¹⁰⁹然而這類舉動，必須有擔當者方敢為之。嘉靖年間，蔡汝楠(1514-1565)論邊事嘗言：「弘治亦曾搜套，

¹⁰⁶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 15，〈兵律三・關津・私越冒度關津〉，頁 679。

¹⁰⁷ 賀欽(明)，《醫閭先生集》，收入《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第 4 集，第 1-2 冊，卷 4，〈參戎李公墓誌銘〉，頁 1089。

¹⁰⁸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107，弘治八年十二月丙辰條，頁 1953-1954。

¹⁰⁹ 雷禮(明)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92-94 冊，卷 126，〈姚鎮〉，頁 518。過庭訓(明)輯，《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33-536 冊，卷 48，〈姚鎮〉，頁 277。

邊民頗得樵牧其中，不圖今日遂為虜巢。稍復故事，即拯安生民。」¹¹⁰可見他並不反對延綏軍民邊外樵薪，而且認為應該恢復「搜套」之舉，以解決邊軍與百姓生活燃料的問題。

然而，軍隊是一個階級分明的封閉性體系，軍官可以強制小兵做許多事，甚至是違犯法紀的任務，出邊採薪或伐木就是其中的一項。洪武十二年(1379)，刑部奏言：古北口千戶擅役軍士八人出境伐木，為蒙古人所殺，論罪當死，而衛指揮以下七人，俱當連坐。太祖曰：「千戶違法擅役軍致死，可論如律，餘人並宥之。」¹¹¹這位古北口千戶令軍士八人出境伐木，究係基於何種原因，現已無法推知。實際上，在明代官方資料中，經常提到軍官「私役」軍士出邊的問題，而所謂「私役」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其一係基於法制而言，即使為的是情有可原的事項（如修建營房與邊牆），還是違反朝廷的禁例；其二係基於圖利而言，即軍官假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實際是為了個人私事或私利。

前面談到，明代將領常因為燃料不足，或為營建工事及籌措撫賞銀兩，命令軍士出界採集柴薪或伐木，但從諸多事例看來，有些純粹是為了個人私利。如宣德四年(1429)，宣府前衛指揮章容，私役二名軍人出境採木營建私宅，軍人為蒙古所殺，所乘官馬也被掠去。¹¹²宣德六年，鎮守寧夏的寧陽侯陳懋(1379-1463)，私遣軍士二百餘人，操舟三十餘艘，出境外捕魚、採木，為韃靼所執者十餘人。¹¹³景泰六年(1455)，宣府鎮萬全右衛守備都指揮喬清等，擅令夜不收王加兒，出境採材木私用，被蒙古人追趕凍死。¹¹⁴天順三年(1459)，忠國公石亨(?-1460)私遣義勇後衛指揮同知裴瑄，出居庸關販取材木，碰巧兵部召裴瑄赴京，裴瑄未到，兵部為此奏聞。英宗命都察院、錦衣衛逮捕不獲，乃降旨向石亨索人。石亨不敢據實稟告，因此逮捕之命愈急。不久，錦衣衛指揮僉事遼東自大同將裴瑄械送至京，由三法司會審，鞫問

¹¹⁰ 蔡汝楠(明)，〈據愚個言邊情贊修攘以光神武事疏〉(收入《明經世文編》)，卷 315，《白石先生集》，頁 3341。

¹¹¹ 李景隆(明)等撰，《明太祖實錄》，卷 124，洪武十二年四月壬寅條，頁 1989。

¹¹² 楊士奇(明)等撰，《明宣宗實錄》，卷 57，宣德四年八月己丑條，頁 1361。

¹¹³ 楊士奇(明)等撰，《明宣宗實錄》，卷 76，宣德六年二月壬子條，頁 1768。

¹¹⁴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249，景泰六年正月丁未條，頁 5385。

得出實情，乃奏請治石亨之罪，並彈劾居庸關守將仲福，僅憑石亨私人書信，即縱放裴瑄出關。英宗命姑且原有石亨之罪，但將仲福為降職為指揮使。¹¹⁵

為了禁絕此事，兵部與相關官員不斷上奏建議嚴禁。成化八年(1472)，兵部上奏曾說：「各邊守臣耽溺宴遊，或私役軍士出境樵獵，以啟邊釁」，乞請降勅，諭令注意防守，憲宗應允。¹¹⁶成化十年(1474)，兵部右侍郎滕昭(1421-1480)又奏言：「虜寇每因冬寒，入邊鈔掠，恐諸邊守將視常怠忽，或私役軍士出境樵獵，致虜乘虛入寇，宜勅諸邊整兵防禦」，亦獲憲宗批准。¹¹⁷兵部隨即將勅書頒至各邊鎮，正德《大同府志》就收錄這一勅書。¹¹⁸成化十七年(1481)，山西巡撫何喬新(1427-1502)也奏請朝廷降旨：「軍民人等，但有私出外境釣豹、捕鹿，及管軍頭目私役軍人，出境砍木、掘鼠等項，事發俱問擬如律」。朝廷於是下令禁止邊人出境。¹¹⁹弘治二年(1489)，宣府巡撫張錦上奏：「近歲沿邊守備等官，不以邊事為重」，常縱令軍人「辦納工作，出境樵採，以致胡虜乘虛，多被殺虜」。其中，四海冶堡緊鄰山陵，但「各官曾不究心，樵牧如故」，乞請加以嚴禁，以後軍官有令軍餘出境採樵、獵物，以致啟釁招寇者，杖一百、罷職充軍。奏章至京，都察院覆奏，請令各邊禁約此事，孝宗從其所議。¹²⁰

但私役軍士至關外伐木的問題，並未因禁令而止。弘治六年(1493)，懷來分守右參將盛忠依然私令軍人出境伐木，致有士兵為蒙古兵所殺。¹²¹弘治九年(1496)，守備薊州鮎魚石等關的鎮守中官羅紉，也擅令軍士出境伐木，被鞭毆殺死二人。¹²²弘治十一年(1498)，羅紉又私役軍士採木，被鞭毆殺傷四人。¹²³正德十年(1515)，兵科給事中毛憲(1649-1535)也談到：「切聞先年塞外蹊徑狹隘，林木茂盛，足以限虜

¹¹⁵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卷 307，天順三年九月己亥條，頁 6469。

¹¹⁶ 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卷 109，成化八年十月丙寅條，頁 2121-2122。

¹¹⁷ 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卷 134，成化十年十月辛亥條，頁 2527。

¹¹⁸ 張欽(明)纂修，(正德)《大同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6 冊，卷 12，〈聖朝制勅〉，頁 347。

¹¹⁹ 戴金(明)編，《皇明法條事類纂》(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 29，〈兵部類·移出外境及違禁下海〉，頁 720-721。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卷 215，成化十七年五月乙未條，頁 3736-3737。

¹²⁰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22，弘治二年正月丙戌條，頁 514-515。

¹²¹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72，弘治六年二月甲辰條，頁 1347。

¹²²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118，弘治九年十月癸卯條，頁 2138。

¹²³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卷 135，弘治十一年三月庚條，頁 2370-2371。

騎之馳突」；但近來「或潛通樵牧，或公行採伐，遂使林木蹊徑蕩然空闊」。故他建請朝廷下令：「凡邊牆隘口、蹊徑林木、墩堡之類，嚴禁樵採，重治私通」。¹²⁴

隆慶年間，明蒙雙方議和之後，邊鎮將領仍然多方剝削軍卒，「柴薪有銀，可取之宮中而自足也，乃驅軍而出邊外，日以樵柴、燒炭之役督之」。¹²⁵而在萬曆元年(1573)正月，薊鎮喜峯口守備鄒軻擅役軍士出邊採木，恰巧朵顏衛董忽力等部酋率部民三百七十餘人至喜峯口要求撫賞，與採木勇士高儒起爭執，兩軍隨之互相格鬥，結果明朝的通事與軍丁四人被殺，軍士十三人被擄，明軍擄獲牧民、牲畜相當。隨後，鄒軻詐稱出邊是為採取柞木。¹²⁶萬曆十一年(1583)六月，薊鎮古北路游擊戚金，擅自開關門牧放馬匹，並私役軍人採伐木板販賣，遭到土蠻大嬖只部落達子約六百餘騎埋伏，敵騎分為二股南下，一由東大川，一由西潮河，奪馬一百七十一匹，殺死尖夜家丁一十一名，搶去軍人一十七名。為此，總督加以參劾。為此，兵部在覆奏時建議：「仍將沿邊關口盡行嚴禁，非丁夜哨探，不許私放一人出入。有差人出邊採木者，坐贓參究。」¹²⁷但禁令並未發生實效。萬曆十三年，薊遼總督王一鶚就劾奏潘家口提調陳所政「私縱夜役劉良、王典全等取木耳、柴薪於口外，致屬夷撲捉張思公、李東等三名，操馬四匹」。¹²⁸萬曆十六年(1588)，王一鶚又劾奏薊鎮松棚路游擊高徹，私自派「尖夜八十餘名，為採板於遠山，順河所運者數百塊，王剪兒等乃出樵之役」。¹²⁹

私役軍士出境伐木之事，在遼東邊區極為常見。萬曆十七年(1589)，遼東巡撫顧養謙(1537-1604)即彈劾遼東正兵營督陣加銜遊擊李某，「借言查點而苛罰乎邊堡出邊伐大木四十餘根」。¹³⁰萬曆十九年(1591)，侯先春(1545-1611)巡按遼東，在奏疏

¹²⁴ 毛憲(明)，《諫垣奏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22冊，卷2，〈言備邊患〉，頁481-482。

¹²⁵ 顧九思(明)，《掖垣題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4冊，卷下，〈題為虜款雖堅邊事宜飭懇乞聖明議處大師保愛疲卒以壯威勢以固疆場事〉，頁82。

¹²⁶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11，〈紀部·隆萬經略〉，頁359-360。

¹²⁷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11，〈紀部·隆萬經略〉，頁395。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138，萬曆十一年六月丁卯條，頁2576-2577。

¹²⁸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卷5，〈查參貪肆將官疏〉，頁588。

¹²⁹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卷10，〈舉劾四鎮將領疏〉，頁555。

¹³⁰ 顧養謙(明)，《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62冊，卷17，〈甄別練兵官員〉，頁646。

中亦指出：「夫邊軍所以備征戰也，邇來私役百端，科索萬狀」，「其採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軍，晝夜皆居塞外」。¹³¹萬曆三十餘年，遼東遼陽副將吳希漢，「每堡調軍金海等八名，差旗牌陳國寶管領採木，順水撐放至遼陽永智門外木場，交與旗牌倪安發賣，約四百餘兩」。¹³²其伐木地點，就在界外的遼河流域。有些遼東將領則假藉籌措撫賞銀之名，行中飽私囊之事。萬曆三十八年(1610)，遼東巡按熊廷弼糾舉原寧遠參將傅元勳曾提到：濫用蟒緞等物加賞插罕部酋貴英，求其派蒙古兵前來各山上架梁，隨即傳調全城各站所、邊堡、鄉屯車輛一千餘輛，赴邊外黑松林砍伐大松木，在邊外住宿一夜，來回計二日，方才進邊牆內。每大車收取稅銀六錢，中車收取稅銀四錢，小車收取稅銀二錢，一次抽銀計八百餘兩，前後共計三次，「名為撫夷公用，盡歸私囊」；另又「取大過梁木一對，用軍三百名，每次取大木二對，三次共取大木六對，每對賣銀一十五兩，共得銀九十兩」。¹³³萬曆四十三年(1615)，遼東高臺堡提調吳東魯，亦「私役軍兵出邊樵採，以致軍馬損失」，兵部為此奏請朝廷：吳東魯由巡按御史提問論罪，廣寧前屯衛參將李繼功，「出採雖不預聞，失事乃其所屬」，故罰俸二個月。¹³⁴

類似情事，在其它各鎮也有記載，如萬曆二十二年(1594)，寧夏參將楊紹祖役使軍人採木與捕魚，「為達虜突擊，致傷人馬」。¹³⁵萬曆三十八年，巡按陝西御史穆天顏奏請「禁厲役」，兵部奏准：「將領不得驅邊軍塞外為己經營，或採辦方物，與輸納月錢等事。不悛者，廉實，坐贓究遣。」¹³⁶可見陝西也有同樣的問題。萬曆四十年(1612)九月，山西老營堡守備馬某亦私役墩軍路允間出界伐木，因而被蒙古人擄去。¹³⁷

另一方面，出邊打探敵情的哨兵，也常偷砍木材進關。萬曆初年，陳第曾與戚

¹³¹ 侯先春(明)，《諫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侯晟重刊本），卷上，〈安邊二十四議疏〉，頁 64b-65a。

¹³²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91 冊，卷 1，〈糾劾將領疏〉，頁 444。

¹³³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卷 5，〈考選軍政疏〉，頁 682。

¹³⁴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530，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庚申條，頁 9976。

¹³⁵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272，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條，頁 5048。

¹³⁶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472，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辛巳條，頁 8907。

¹³⁷ 吳仁度(明)，《吳繼疏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2 冊，卷 5，〈考選軍政糾劾不職將領疏〉，頁 608。

繼光提到暗哨之弊有三：一曰偷安，二曰懦弱，三曰多歧，「偷安」所指乃是：「尖夜不在撥，或遁而私歸，或私砍板伐木，或合數撥之人聚於一處，為賭錢鋪牌之戲」。¹³⁸其實，夜不收、哨探被派至口外，回來時常必須帶回薪材，這是任務以外的額外要求。隆慶三年，薊鎮總兵戚繼光提到：「近各路走虜尖夜，一概計日採木，責取價銀，非所以厚勸養而專責成也。」因此下令各軍：「其尖哨應免柴木，宜遵所諭，不得仍襲前轍」。¹³⁹不過，此令是否達到成效，不得而知。萬曆十三年，薊遼總督王一鶚曾劾奏薊鎮大水峪提調董應選，「責哨役帶採口外木板，每次一塊，則一年得□百兩」。¹⁴⁰而在明末，這類的情事還是存在。崇禎四年(1631)十月，張國威陞任宣府東路永寧參將，後來爆發了通虜一案，其中亦涉及私役哨丁伐木。事情的來龍去脈是：張國威的投充家丁李天亮、家人傻郭三，熟知邊外原係敖目比吉住牧，常在邊上作歹，自崇禎三年(1630)間會兵進剿之後，敖目等移帳遠去，李天亮等認為是砍販枋木的好時機，屢次向張國威說起，後來獲得允許，自崇禎五年(1632)十一月起，派遣傻郭三、李天亮及斫手馬仲元，假借哨探為名，每班二十名出邊，短哨每五日一回，長哨每十日一回，至七年(1634)七月止，共計二十個月，每月砍松、栢枋木九十塊，共砍松枋九百塊，每塊值銀四錢，共值銀三百六十兩；栢枋九百塊，每塊值銀八錢，共值銀七百二十兩。其細部情況，據各相關人等口供：寄住永寧堡的山西逃犯馬上威，見砍木有利，跟隨國威哨丁出邊，將近二年，約砍松枋四十塊，栢枋五十塊。劉斌堡長哨沈計忠（即魏剛），每月出口三次，每次帶回不拘松栢枋木一塊，約三年，共賣松枋四十塊，栢枋三十塊。國威家丁王麻子，陸續跟隨長哨出邊外，砍松枋四十塊。劉斌堡長哨王二，每月出口三次，每次帶回不拘松栢枋木一塊，共賣松枋三十塊，栢枋十塊。劉斌堡哨丁徐來慶（即馬禮），每五日出邊一回，二年來約砍松枋四十塊，栢枋三十塊。靖胡堡長哨郭二，每月出哨六次，約一年共砍松枋三十塊，栢枋四十塊。劉斌堡長哨馬二（即馬仲元），每月出哨六次，約三年內共砍松枋二十塊，栢枋五十塊。周四溝長哨池一位、梁汝明二人，每月出

¹³⁸ 陳第(明)，《一齋集·薊門兵事》，卷上，〈備邊類·備邊五事答戚總理〉，頁 29a-b。

¹³⁹ 戚繼光(明)，《戚少保奏議》，補遺卷 2，〈免哨探入役柴木〉，頁 207-208。

¹⁴⁰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卷 1，〈參貪肆坐營提調疏〉，頁 92。

哨三次，約一年餘，共砍栢枋三十塊。¹⁴¹這些砍伐松栢枋木數字，與出入所須帶回的數目不盡相符，或許有時因有特殊情況而未帶回。晚明六、七十年間，由於宣府以西邊境較為平靜，守邊軍士出邊哨探，順便伐木返回的個案應該不少，祇是未被查獲而已。

陸、牧民採伐與邊境木市

明代邊外分布著蒙古等部族，其車輛、帳幕多半以木材組合而成，而炊爨多多少少也使用柴薪做為燃料，故對森林也有所砍伐。景泰三(1452)年九月十四日，據寧夏鎮宿巍口外淡溝塘哨探夜不收景彥成走報：「本月十三日酉時分，瞭見正西水窩有達賊八人，騎牽馬一十五匹，到於賀蘭山後口外松林內砍打椽棒，至戌時分駛往舊路去訖。」¹⁴²另外，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河套內的蒙古部族，「採木于黃河西岸，大治簿筏，將渡河而東」，大同方面防守官員建議，趁其未渡河時，令巡撫山西偏關等處都御史魏紳(?-1506)，「選善水者，乘夜過河，潛斷其木筏，并焚其所積材木」。¹⁴³後來，乃知是虛驚一場。另外，萬曆十六年(1588)六月，薊鎮總督張國彥(1525-1598)等上奏：「屬夷幹多羅忽令部夷擄落等衝放筏板，潛入潘家口」，殺死軍士二人，奪去馱磚軍馬三匹，蒙古兵卜兒大等五人隨即被官兵擒獲。¹⁴⁴由此可見，蒙古部族對塞外的森也都砍伐利用，甚至造船或結成木筏，做為攻擊明朝的戰具。

另一方面，在明代中葉，燕山以北的牧民已經伐木與漢人私下交易。嘉靖十七年(1538)，兵部覆給事中薛廷寵等〈條陳邊務〉說到：「喜峰口邊外，多產松、椴等

¹⁴¹ 佚名(明)，〈兵部等部題行「兵科抄出宣大巡按梁雲構題」稿〉(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丁編第六本，頁 501a-502b。

¹⁴² 于謙(明)，《于忠肅公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明天啓間閩中沈昌裔刊本紙燒本)，卷 2，〈兵部為聲息事〉，頁 51b。

¹⁴³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76，弘治十四年七月癸丑條，頁 3214-3216。

¹⁴⁴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99，萬曆十六年六月癸亥條，頁 3738。

木，官民乘時窺利者，往往闌出通虜，與之貿易，當嚴為禁革。」世宗批示如議嚴禁。¹⁴⁵但這中間存在一個問題，即守關軍士縱放或互相勾結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靖中葉，邊境上曾經出現木市，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朵顏部圍攻墓田谷，殺死守備陳舜等，¹⁴⁶朝廷為此降旨：「罷舊設三衛馬市，并新設木市亦罷之」。¹⁴⁷不過，「新設木市」的地點究竟在何處，現存資料均未記載。嘉靖二十六年(1547)五月，兵部覆奏遼東巡撫於敖、巡按御史張鐸勘驗事宜，其中提到：「金州諸島造舟，皆取木邊外，請於沿江臺堡設巡檢司，以革販木之弊」。¹⁴⁸江嶋壽雄認為：造舟所須木料，應該就來自錦州、義州、寧遠前屯一帶邊外，而此即萬曆年間「寧前木市」的前身，屬於走私的階段。¹⁴⁹另據記載：嘉靖三十年間，栢哥（小歹青之祖）帶領部眾二千餘騎，在義州大康堡、大平堡邊外住牧年久，自居是地方屬夷，近邊「講易木植買賣」，參將王重祿「因栢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精健兵馬，足堪防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馱米糧與栢哥，止換木植二、三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圈，亦無請動官錢」。後來，韃靼得知此事，對於其向明朝靠攏感到不悅，帶領部眾將栢哥等殺回，交易於是中止。¹⁵⁰

隆慶四年以後，明帝國與俺答等達成和議，既而展開馬市貿易，其中入口的商品中，不乏漠南的大木，故蕭大亨《北虜風俗》說：「彼中松栢連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木不可勝用矣」。¹⁵¹由於宣府以西各鎮的馬市，以馬匹交易為大宗，木材的交易僅是附帶，因此未見資料提及。不過，宣大總督王崇古曾提到牧民前來交易，「挑柴一擔，易米二三升」。¹⁵²由此可以證實，漢蒙的柴薪交易是存在的。

萬曆中葉，在遼西走廊邊境，則出現以專事買賣木材的木市。萬曆二十三年

¹⁴⁵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210，嘉靖十七年三月癸未條，頁 4336。

¹⁴⁶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280，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條，頁 5454。

¹⁴⁷ 張廷玉(清)等撰，鄭天挺等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28，〈外國九·朵顏〉，頁 8508。

¹⁴⁸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323，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戊午條，頁 5991。

¹⁴⁹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頁 86-87。

¹⁵⁰ 李化龍(明)，《撫遼疏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9 冊，卷 3，〈議義州木市疏〉，頁 116-121。

¹⁵¹ 蕭大亨(明)，《北虜風俗》，〈耕獵〉，頁 12。

¹⁵² 蕭國亮，〈明代後期蒙漢互市及其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雜誌社，1985），頁 67。

(1595)四月，朶顏部酋首小歹青，欲赴廣寧關市買賣、領取撫賞，仍舊砍伐木材，用車裝運，但因山嶺阻礙，前赴關市不便，想從大凌河順水放木筏，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市場，與軍民交易。遼東巡撫李化龍(1554-1611)令各路將領表示意見，遼東副總兵李如梅呈上義州備禦盧得功等人的看法：

今照小歹青既要從大康堡凌河放木買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定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地方；亦當有木場馬圈，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岸。其駕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即駐本堡專管木市事務。防範兵馬，本城育馬官軍家丁，除公差塘砲等項外，見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合無于別營量撥勁兵一枝以防不虞。每歲春秋二季，每季按月三、五次，准其出入交易，以復先年舊例。

其所提到的「舊例」，指的就是小歹青之祖栢哥，在大康堡、太平堡邊外交易木材之事。但錦州前任遊擊劉仲文則不贊成開設木市，原因在於：「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人互市，在于大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後遇年荒，大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夷市禁止；及查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兵馬單弱，防護不便，似難開市」。¹⁵³

李化龍與薊遼總督孫鑛(1543-1613)、遼東總兵董一元、山東巡按御史宋興祖等磋商，並與小歹青所派遣的刺麻僧說：「爾無入則我無出」，不再出塞搗巢；但希望「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十五堡，爾無以一人一騎入」；若有其他部族從此進入者拒之，拒之不得，則以實情傳報，俾我軍得以提早準備。旋即令使臣至關口，「殺馬牛、鑽刀，說誓盟於天。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不久，長昂聚兵三千謀犯寧前，歹青遣使傳報長昂將進逼錦州、義州。由於預先得知軍情，副總兵李如梅在邊境上以逸待勞，遂將長昂部眾擊退。李化龍因此相信小歹青有誠意展開互市，於是開始詢問小歹青賣木之事是否可行，據各關將領等回覆，皆說有利無害。李化龍尚

¹⁵³ 李化龍(明)，《撫遼疏稿》，卷3，〈議義州木市疏〉，頁116。

不敢深信，又召集地方百姓之有智慧者，及士人之熟習邊事者，一一加以咨詢，皆說可行。綜合大家的看法，開設木市有五便，其中第一便為：

河西無木，木皆在邊外。自屬夷叛亂以來，遼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費，止仰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至亦不多，故河西之材木貴于玉。自市通，而河西材木不可勝用也。

李化龍雖知「此五者，利害較然如白黑」，但覺得還須再加觀察，既而「自夏及秋，果無零賊內入者」。他又恐外族假藉入市而有其他舉動，或於市中生事，因此暫與其約定市期，藏匿士兵以待，而令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其互市，並限制不許多來，以免衍生其他問題。九月二十日，前來者百餘人，放流木材三百五十根，至堡前濱河與軍民交易。李如梅等即以所得市稅，購買酒食酌量賞賜，「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直到這時，他才覺得「此酋目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無疑」。至於木市之地，宜在義州大康堡，以其靠近大凌河，且是先年舊市所在。市期每年春、秋各一次，春季以三、四月，秋季以七、八月，河水方盛，便於放木，「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互市不過三、五次，來人不過五、六百，便以防防範。互市之時，撥正兵營勁兵一千員防護，交易完畢後即歸營。開市之後，觀察外族之動靜，再看是否需要罷市或再開市。¹⁵⁴

但木市開設不久，就因故停止。據遼東巡撫李植奏言：義州木市「行之三年無譁，後因將領多有短值勒掎夷木者，夷人恨之，焚木而去，不復再來，木市遂罷」。¹⁵⁵遼東巡撫趙楫則說：「夫廣寧馬市設自成化十四年，義州木市設自萬曆二十三年，嗣因土酋內訌，前撫臣張思忠請槩罷市」。¹⁵⁶另據《實錄》記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遼東巡撫張思忠奏言：土蠻之子撻臣慙糾合小歹青，每年既得市賞，又要比照宣、

¹⁵⁴ 李化龍(明)，《撫遼疏稿》，卷3，〈議義州木市疏〉，頁116-121。

¹⁵⁵ 王圻(明)，《續文獻通考》(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31，〈市糴考·市舶互市·皇明〉，頁1894。

¹⁵⁶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375，萬曆三十年八月甲午條，頁7043。

大撫賞，且時肆搶掠，馬市、木市因此議罷。¹⁵⁷以上三種記載，其中存在著連帶關係，應該是「將領多有短值勒指夷木」之事，造成外族心生不滿，故後來「時肆搶掠」，加上馬市的其他問題，張思忠遂奏言停罷。

萬曆二十八年(1600)，遼東總兵官馬林(?-1619)、兵備道張中鴻復議重開木市，與巡撫李植意見相左：「撫臣不欲開義州、廣寧木、馬市以苟安而弛內備；鎮、道欲開市以便耕牧、息土馬」，因此互相矛盾，「論久不決」。¹⁵⁸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指出：馬市、木市俱與「戰守軍機毫無干預，茲總兵、該道惑于地方糜虜之說，遂堅意舉行，而訓練兵馬置之不講」；及至外族「內犯屢警，輒咎於撫臣不從之致」。¹⁵⁹先春又奏言：巡撫與總兵、兵備道兩方議論不相合，巡撫認為：「不市不至重失虜心，市亦不至重傷國體。但必夷心果出忠順，內備不因廢弛，無不可者」；而總兵、兵備道則謂：「開市雖不能弭虜之大犯，亦可免虜之零竊，以便屯民耕牧，以息土馬奔馳」。他建議朝廷勅令巡按平氣靜氣，儘快定議：「如宜市則明言其宜市，如不宜市則明言不宜市，查虜情之順逆，詢眾論之從違，酌邊勢之安危，究互市之利害，勿徇一偏之見，勿為兩可之詞，務利地方，無傷國體」。¹⁶⁰不久，兵部覆奏：「遼東木馬二市應開與否，本部已經備行總督撫按會議，今科臣議欲專責成按臣，謂按臣身居事外，必有定議折衷其間，第總督、撫、按共事一方，休戚與同，宜仍行督撫按諸臣詳計利害，可開則開，不可則止。」疏入，得旨：「會該總督、撫、按酌議具奏，毋得含糊兩可，耽誤邊機。」¹⁶¹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趙楫由陝西右布政使兼榆林中路兵備副使，陞任遼東巡撫，接續李植之職。上任之時，正值「諸夷不忘市賞，節次叩關，土民亦為陳乞，奉旨酌議未決」。其後，他與總兵、兵備道諸臣再四商議，均認為應重開馬市與木

¹⁵⁷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66，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條，頁 6847-6848。

¹⁵⁸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48，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己亥條，頁 6512。張廷玉(清)等撰，鄭天挺等點校，《明史》，卷 228，〈李化龍傳〉，頁 5984。

¹⁵⁹ 侯先春(明)，《諫草》，卷下，〈調酌撫道疏〉，頁 42b-43a。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48，萬曆二十八年六月癸酉條，頁 6490。

¹⁶⁰ 侯先春(明)，《諫草》，卷下，〈遼鎮秋防疏〉，頁 46a-47a。

¹⁶¹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49，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乙巳條，頁 6522。

市，因此上疏奏請。¹⁶²實際上，在兩市停罷之後，外族「大舉零竊，歲無虛時」，遼東全鎮皆感困擾；而外族諸酋也屢次前來請求互市，「歹青、撻臣慙等咸集近邊，願准二十三年撫賞，一聽約束」。萬曆二十九年(1601)，遼東總兵李成梁認為開市可行，「請身任其事」。朮顏部酋長昂、董狐狸、老絲孩子三人亦請重開寧前木市，總兵尤繼先應允所請。薊遼總督萬世德(1547-1602)為此奏聞，其中談到：「虜情不可知，即嘉、隆之間，何年不開市，何年不大搶，不過外示羈縻，內修戰具耳，豈可以往年之虜或市或搶，恐人之議其後，而不為擔當哉？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利多害少則為之，若有利無害，復持兩端以觀望，豈人臣所以計安邊境者乎？」十二月間，兵部依照世德之言覆奏建請重開，戶部覆奏亦持相同意見，既而奉旨：「朮顏各夷馬、木二市准開復，撫賞照二十三年例行，寧前木市亦聽便宜開復。仍督道、將嚴修戰守，不許從旁阻撓牽制。」¹⁶³

關於晚明遼東鎮的木市，學者所論主要以義州為多。¹⁶⁴但在義州之外，還有寧遠木市，即所謂寧前木市。萬曆二十九年，恢復義州木市之時，同時恢復寧前木市。江嶋壽雄依據隆慶五年遼東巡撫張學顏所奏：「虜來求市，宜令寧前亦如廣寧例賞之，不必拒絕」，認為寧前木市就在這一年經由官方認可而正式展開。其開設的地點，即在六州河旁的寧遠前屯高臺堡，及在寧遠河旁的寧遠衛興水縣堡，是朮顏部專屬的交易之地，與廣寧專屬插漢部，兩者有所區隔，以免發生糾紛。¹⁶⁵按此說法，寧前木市乃是遼西走廊最早出現的木市，但還須要更多史料相佐證。

另據熊廷弼指出：「寧遠興水縣堡、中後所高臺堡二關口，於萬曆二十九年開復木市撫賞起，至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杜總兵殺款之後，各夷歸巢。至三十七年，各夷復叩關乞賞，准其復款」。¹⁶⁶所謂「杜總兵殺款」之事，乃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朮顏部酋賴蟒糾眾入犯河流口，又糾集插漢部酋黃台吉欲入犯喜峯

¹⁶²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75，萬曆三十年八月甲午條，頁 7043。

¹⁶³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366，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條，頁 6847-6849。王圻(明)，《續文獻通考》，卷 31，〈市糴考・市舶互市・皇明〉，頁 1895-1896。

¹⁶⁴ 相關研究，參見：杜婉言，〈明代木市初議〉，頁 146-147。白鳳歧，〈淺談明清時期遼寧蒙古族的經濟〉，頁 87-88。特木勒，〈小歹青身世與義州木市〉，頁 90-93。

¹⁶⁵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頁 87-88。

¹⁶⁶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卷 5，〈再請撫賞疏〉，頁 655。

口，薊遼總督王象乾(1546-1630)認為太過猖狂，不得不集中兵力來一次清剿，於是以薊鎮總兵王國棟搗其西，以遼鎮總兵杜松(?-1619)搗其東；並奏言：「賴酋與其父長昂，皆宣鎮款虜曰洪大之婿，長昂與其妻皆在宣鎮領賞，長昂及其醜類在薊有貢賞、有撫賞，在遼有木市、馬市之賞，計不下萬金。」¹⁶⁷而由於東總兵杜松出塞搗巢，寧遠木市為此短暫停止。萬曆三十七年(1609)三月，熊廷弼奏疏中提到寧遠衛學諸生的揭帖說：「自萬曆辛丑（二十九年），拱兔、貴英叩關請款，許開木市，不為邊害」。木市重開之前有十害，重開之後則有十益，其中三點與森林相關：其一、先年軍士出境採木，必須五營兵馬防禦，猶且不能擔保無閃失，現今聽任採取，轉賣給百姓，以做為撫賞的費用。其二、先時百姓樵採無所出，甚至有「毀室棄物以資炊爨者，今不時開山，任樵取自往，柴不可勝用」。其三、先年松木建材，即使「尺長寸短，難得充用」，現今外族載大木而來，百姓以布交易，方便而且價賤。¹⁶⁸由此可見，木市對於邊民來說相當重要。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熊廷弼奏報寧遠木市恢復後，拱兔一枝在寧遠興水縣堡市口領賞，一年的賞物及食用，共計銀二千餘兩；徠量大一枝在中後所高臺堡市口領賞，一年的賞物及食用，共價銀三千餘兩。二市加起來，一年總計約用銀五千餘兩。但是，「夷人運木稀少，抽收稅銀不足供市夷食用，原係動支廣寧庫原扣留寧前應該馬價撫賞，今馬價既奉文不許動支，合無請乞俯准請發帑銀每年五千餘兩，以濟撫賞之用」。¹⁶⁹實際上，稅銀短少也與將領私吞有關。萬曆三十八年，熊廷弼參劾原寧遠參將傅元勲，就提到其與「夷酋貴英買好，大開木市，令牢子官張威等，帶領數十餘人，易換松栢等木數萬，并抽收商稅銀千兩有餘，止報十分之一」。¹⁷⁰

另外，又有錦州木市，始於何時不可知。交易地點在錦州城西、小凌河支流女兒河邊的大福堡，市賞的部族為插漢部拱兔一枝系。¹⁷¹

除了義州、寧遠、錦州之外，後來遼陽也有木市。約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

¹⁶⁷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 454，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庚寅條，頁 8564。

¹⁶⁸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卷 2，〈論捷功異同疏〉，頁 492。

¹⁶⁹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卷 5，〈再請撫賞疏〉，頁 655-656。

¹⁷⁰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卷 5，〈考選軍政疏〉，頁 682。

¹⁷¹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頁 88。

熊廷弼答遼東總兵麻貴(?-1617)的信上曾說：「誠如近議，於長勇間開一木市，寒酋首之望，且令零種窮夷伐木買賣，有所過活，不至慫恿其頭目為亂，而我因得以生養休息於其間，專一收拾，不生外覬，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則此番一創，未必不為地方之幸。」¹⁷²但長勇堡開設木市之事後來未成。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遼陽木市開設於長安堡。據張鼎(?-1629)《遼夷略》敘言說：「萬曆四十三年，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西自廣寧，東至遼陽，境外遊牧絡繹，是虜亦以木市為命矣」。¹⁷³在長安堡木市交易者，為鈔花部眾（清人所謂的內喀爾喀五部之一），萬曆四十三年開市以後，自廣寧鎮遠堡以東、遼陽以西，「塞外諸夷落往來遊牧無禁」。¹⁷⁴

天啟元年三月，鈔花與巴領爭奪市賞，攻陷遼陽長安堡，隨之後金占領遼陽一帶，木市因此斷絕。長安堡淪陷後，鈔花領賞轉至廣寧鎮夷堡，木市也在鎮夷堡進行。¹⁷⁵程開祜《籌遼碩畫》卷首〈遼東圖〉，就標示廣寧鎮夷堡、義州大康堡、錦州大福堡、寧遠興水縣堡、中後所高臺堡皆有木市。¹⁷⁶（參見圖八至九）天啟二年二月，兵部覆議王在晉奏事也提到：

查諸夷大馬市，在廣寧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寧鎮夷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寧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朵顏衛夷人入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稅。¹⁷⁷

但廣寧鎮夷堡木市，存在時間相當短暫。天啟二年，後金開始侵掠遼河以西，廣寧、義州、錦州等河西要地受到攻擊，後來各部族之市賞移到山海關，鎮夷堡、大康堡、大福堡的木市不可能舉行，而興水縣堡、高臺堡的木市也隨之斷絕。¹⁷⁸崇禎二年

¹⁷² 熊廷弼(明)，《遼中書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2冊，卷1，〈答麻西泉總戎〉，頁653。

¹⁷³ 張鼎(明)，《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6-77冊，卷25，〈遼夷略·敘言〉，頁669。

¹⁷⁴ 張鼎(明)，《寶日堂初集》，卷25，〈遼夷略〉，頁676。

¹⁷⁵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補遺〉，頁158-161。

¹⁷⁶ 程開祜(明)輯，《籌遼碩畫》（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8），卷首，〈遼東圖〉，頁18-19。按：該書輯於萬曆四十八年神宗駕崩以後，而圖可能是天啟元年以後所加，故反映的是天啟元年以後的現況。

¹⁷⁷ 王在晉(明)編，《三朝遼事實錄》，卷7，頁789。

¹⁷⁸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補遺〉，頁161-162。

(1629)，朮顏束不的部以荒旱無食要求互市，遼東督師袁崇煥於寧遠高臺堡開市，原本僅同意以布、米易換關外的柴薪，後來經過商議，同意對方要求，亦互市貂皮與人參。¹⁷⁹

正如學者所指出，晚明遼東的木市，計有遼陽長安堡、廣寧鎮夷堡、義州大康堡、錦州大福堡、寧遠興水縣堡、寧遠中後所高臺堡六處。¹⁸⁰但其存續長短不一，廣寧鎮夷堡木市甚至僅一年。至於互市的對象，按照前面的討論，義州大康堡、錦州大福堡是插漢部，寧遠興水縣堡、寧前高臺堡是朮顏部，遼陽長安堡、廣寧鎮夷堡是內喀爾喀五部。余同元則提出一個說法：義州木市在大康堡、大平堡木市，對象為兀良哈三衛；廣寧木市在鎮夷堡，錦州木市在大福堡，寧遠木市在前屯高臺堡，對象皆為外喀爾喀七部；遼陽木市在長安堡，對象為內喀爾喀五部。¹⁸¹針對他所言廣寧木市、錦州木市、寧遠木市互市對象為外喀爾喀七部之說，曹永年除指出其文中所注史料來源不實外，還說道：「從外喀爾喀到遼西走廊，中間隔著遊牧於今錫林郭勒草原的某些阿祿蒙古部落，遊牧於興安嶺南段至西喇木倫河的內喀爾喀諸部，和遊牧於西喇木倫河以南的察哈爾諸部。木市貿易中，木材是大宗商品。廣寧等三木市，不對近在咫尺並威脅明邊之察哈爾、內喀爾喀和朮顏部落開放，而讓數千里之外的外喀爾喀趕著馬匹運送笨重的木材來貿易，實在太離奇了。」¹⁸²另外，特木勒也有批評：余同元認為萬曆二十三年的義州木市有兩處：大康堡和大平堡，係根據〈論義州木市疏〉有關小歹青伊祖栢哥「在於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的記載，這是錯誤的。¹⁸³

值得注意的是，薊鎮邊境上的潘家口、桃林口也出現木市，但起於何時未見確載。而在雙方交易之地，有所謂「換手」名目。由於利潤可觀，外地人爭相充當「換手」，但人員混雜、管理不易，存在各種弊端。萬曆四十六年(1618)二月，直隸巡按潘汝禎(1573-1627)奉命巡關，在奏疏上提到「夷市當防」一款：

¹⁷⁹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頁 223。

¹⁸⁰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頁 333。

¹⁸¹ 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頁 57。余同元，〈明代馬市市場考〉，頁 65。

¹⁸² 曹永年，〈「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考誤〉，《歷史研究》1996:3，頁 170-171。

¹⁸³ 特木勒，〈小歹青身世與義州木市〉，頁 93。

夫夷饒于木料，由潘家口、桃林口入，而與我內地之民貿易布貨等物，絕之不能，激之不可。奈換手奸民，數百成羣，蟻聚鴟張，刁難射利，使木夷坐困，含憤啓釁，實為隱憂。臣俱嚴示厲禁，潘家口如徐應選充騙，以致木夷持斧劈門，則縛而問之；王廷用等盤據縱惡，則訪而擒之。然人多則奸叢，已經撫臣審革幾半，此後宜著為令，遷安、遵化兩縣之外，其他不許營充，而兩縣充當此役者，大約各二十人而止，且為之平價，不得任意減增，又為之立限，要于隨到隨易，宿蠹其有瘳乎？¹⁸⁴

潘家口的位置在灤河穿過長城處附近，地屬永平府遵化縣；桃林口則為灤河支流漆河（青龍河）入關之處，地屬永平府遷安縣，故潘汝禎建議這兩縣居民才能充任「換手」，而且限制人數在二十人上下。另外，這兩處關口存在著欺騙外族的交易糾紛，及壟斷行市的惡霸，他除對這些不法之徒加以懲治外，也對交易價格、交易時程加以規範。同年七月，兵部尚書薛三才覆奏指出：

夷市之貿易，不獨資其板木之利，亦借此以羈縻之也。無奈奸民充換手者，操狙獍之術，以愚木夷而罔市利，雖峻法繩之，不少衰止，此啓釁在內，為可虞也。而夷人雜沓口外，皆賣木為名，安知無奸細之窺探、狡夷之竊發，乘我所不備者乎？此則伏戎在外，為可虞也。關臣議潘家、桃林二口換手，自遵化、遷安二縣民外不許營充，而又為之限人，為之限日，為之平價，所以防奸恤夷者為甚備。¹⁸⁵

薛三才贊成潘汝禎的處置與建議，但對於內外兩層問題覺得必須加以注意。基本

¹⁸⁴ 潘汝禎(明)，〈謹題為條陳薊鎮事宜仰祈裁議舉行以重秋防事〉，收入程開祜(明)輯，《籌遼碩畫》，卷7，頁922-924。

¹⁸⁵ 薛三才(明)，《薛恭敏公奏疏》，卷12，〈覆議薊鎮事宜疏〉，頁649-651。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卷572，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丁酉條，頁10800。

上，潘家口、桃林口木市之所以出現，可能是邊鎮官員與邊外「屬夷」彼此協商的結果，雙方互信機制的建立尤其重要，但在交易過程中，漢人違背誠信原則，可能破壞互市協議，這是內在的因素；而「屬夷」是否藉此機會混入奸細，甚至展開突襲，則是外在值得提防之所在。

實際上，薊鎮邊境的木市，不僅只有以上這兩處。天啟二年(1622)二月，御史董羽宸奏言指出：「自山海、燕河、青山、建昌，以至冷口、喜峯、松棚、馬欄、牆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各口，或僻不及防，或衝而難禦，或臺圯谷堙，亭障幾空，或為木市、貢道，犬羊所出沒，種種破漏，皆奴騎假道闖入之徑，西虜要挾之門。」¹⁸⁶這段內容雖未指出那些是木市關口，但可以知道木市不只潘家口、桃林口兩處。天啟六年(1626)十月，鎮守山海關太監陶文奏言：

關外潘家口、桃林、界嶺、冷口等處，每年所抽木稅等銀，通計四千有餘，原非正額之供，久作虛糜之耗，乞敕部酌議，或解助大工，或存留修築城堡。

奏疏上了之後，得旨：「邊口各商貿易良苦，各口稅銀既不係正供，著盡行蠲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¹⁸⁷由此可見，除了潘家口、桃林口之外，界嶺口、冷口也有木市。界嶺口有洋河流過，冷口則在漆河支流冷口河穿過長城之處，均可通過河口與牧民交換木材，因此成為雙方交易的地點。

另外，在山海關之西、長城與石河（渝河）交會處的義院口，亦存在漢蒙的木材交易。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山海關城須添建倉房，關內餉司劉孔敬在奏文中提到：「辦買木植一項，詢之本鎮著民，僉云昔年夷虜未訖，凡有興作，皆採買於義院口外，山木籠篴，足以供用。近因邊塵騷，愆嚴內外之防，將義院口之柴柵斷阻，勢難採買，故榆關木植鮮少」。¹⁸⁸可見晚明山海關的建材，主要採買自義院口外。

¹⁸⁶ 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19，天啟二年二月丙子條，頁 966-967。

¹⁸⁷ 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77，天啟六年十月戊申條，頁 3706-3707。

¹⁸⁸ 畢自嚴(明)，《度支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83-490 冊，《新餉司》，卷 27，〈覆關城建廩并議增運價疏〉，頁 191。

至崇禎初年，由於女真西擾，木市為此封閉，以致山海關的木材供應窘困。

清朝入主北京之後，在順治四年(1647)派遣理事官滿都戶等，前往張家口迤東、山海關迤西的長城勘察，據報告指出：在這二千四百零四里之中，「險峻處約六、七里一臺，平坦處約四里一臺」，應留者四百一十七座，其餘二千四百五十座應不用留；至於關口，「洪山口、龍井關口、西常峪正關口、潘家口、冷口，俱係捕魚網戶耕種往來之路；密雲迤後石塘嶺正關口，係民間運木之路，昔戶部於此按板抽稅。以上應留關口共六處。」¹⁸⁹石塘嶺地點靠近古北口，西北面有白河穿過長城而下，與之前的木市口岸相比，其位置最為偏西，朝廷何時准許開設木市，現存資料未見記載。而從報告中僅談到石塘嶺有稅口，未提及潘家口、冷口等曾開木市看來，石塘嶺木市的終結應該較晚。

柒、餘論（代結論）

就森林學而言，影響森林植被變化的因素，包括海拔高度、地形、坡度、雨量、溫度與人類活動等因素。¹⁹⁰在以上諸多因素中，人類活動的影響，無疑最為直接而且巨大，特別是土地墾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森林更是具有殺傷力。明代統治華夏兩百多年間，一直與蒙古處於對立的狀態，雖然晚明七十年雙方關係有所緩和，但畢竟還是兩個不互相統屬的政權。正由於這樣的背景，使農業文明向北擴張受到限制，明朝軍民無法在漠南進行墾殖，也未出現商業性的大規模砍伐，因此森林被大量保存下來。不過，在靠近明帝國防線的若干地帶，明朝軍民基於邊關禁山不得擅自砍伐，以及關內低海拔的林木日漸稀少，出邊採薪的記載屢見不鮮，但其對樹木的傷害是比較小的。另外，為了營建的需要（如修築營房及各種防禦工事），砍伐邊外附近的森林加以利用，在軍方來說應該也是順理成章之事。除此之外，還有

¹⁸⁹ 巴泰(清)等奉敕撰，《世祖章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 35，順治四年十二月庚寅條，頁 417。

¹⁹⁰ 感謝審查人提醒這一點。

一個比較特殊的原因，即為了籌措撫賞「屬夷」的經費，勒令軍士出邊砍伐木材或柴薪，再運入關內賣錢。此外，亦有一兩位將領與官員為解決居民的建材與燃料問題，以兵力防護百姓出邊伐木與砍柴。而軍官為了私利，強制士兵出邊採伐柴木，則常見於記載。

揆諸以上所論，長城以北的森林，夾在軍事對抗、國際關係、商品交易等因素之間，隨著這幾個因素的變化，受到波及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明代軍民對邊界之外森林的影響，還必須討論三個指標。首先，是出邊的頻率。可惜的是，現在我們所見僅是零星的記載，而這些零星的記載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出邊屬於違法行為，且可能遭遇蒙古等部族，特別是正德、嘉靖、隆慶年間，雙方局勢越來越緊張，「屬夷」甚至也被「大虜」裹脅，因此出邊頻率不可能太高。第二種解釋是：明代邊境之外有著「真空」地帶，中間既無農業聚落、也無牧民遊獵，在這當中砍伐木材雖有危險，但與敵眾遭遇的機率不高，因此常常出邊採集柴木。問題是，哪個比較符合當時實情？這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實際情況可能因時、因地、因將領、因政策而有不同。明代後期，隨著與蒙古的關係好轉，出邊的危險性相對降低，出邊砍伐的可能性隨之增加，而官方也默許百姓越界樵採，兵部甚至要陝西四鎮官員掛出令牌，訂定日期與出入時辰，放百姓出關砍伐薪材；薊鎮官員也覆准每月定期出邊砍取木材。但有時邊外的牧民，對此卻不高興。萬曆年間，王樵(1526-1590)就指出：在隆慶和議之後，寧夏鎮黃河以西邊境的牧民，「悉移帳牆外，及我軍偶出樵采，反責我踰邊侵界」。¹⁹¹因此，出邊採材還是有其危險性。

其次，是出邊的距離。同樣地，目前所留下的記載，甚少述明砍伐的地點。但鎮守邊境的將領，職責上多半以不折損兵力為前提，其派遣軍士出邊採集材木，不可能不顧及傷亡，應該會指定較為安全的距離，以免引發嫌隙以致出現軍事衝突。因此，遊牧部族駐牧地以南的區域，應該是明朝軍民出邊砍伐的主要去處。而邊外部族駐牧的地點，與明朝邊界的距離，則各有差異。據茅元儀《武備志》記載：遼

¹⁹¹ 王樵(明)，《方麓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85冊，卷16，頁470。

東擦汗兒達子大部落，在遼陽邊外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邊三百里；擦汗兒達子小部落，則在山前寧遠、廣寧邊外青山住牧，離邊一百餘里。¹⁹²在擦汗兒以北的朮顏部，距離薊鎮各關口更遠，都在三百里以上。¹⁹³不過，朮顏別部亦有極靠長城者，如昌平鎮轄區邊外，朮顏衛指揮使伯彥打賴，及部酋紅花滿川、燒餅頭目、銀頭目等，在四海冶、滴水崖、擦石口、慕田峪、石塘嶺一帶境外地名滿套兒住牧；又夾道野人色振兒、阿羅豆兒等部落，住牧慕田峪境外山谷。¹⁹⁴

至於薊鎮以西，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曾云：宣府、大同、山西三邊之外，「俱諸虜駐牧之地，遠者六、七十里，近者不滿十餘里」。¹⁹⁵就宣府鎮而言，近者如渡口堡邊牆外十四里有「守口夷人」駐牧；寧遠堡盤道口邊外十五里，有一克氣、哈氣兒、朝兔等部落駐牧。¹⁹⁶而其遠者亦有在百里之外者，如長伸地堡迤東一百五十里，為安兔、朝兔二酋巢穴；劉斌堡邊外，有安兔部落駐牧於天克力，離邊約一百五十里。¹⁹⁷茅元儀《武備志》則記載：宣府鎮邊外的哈喇慎大營，與獨石口相對，離獨石邊界三百餘里。¹⁹⁸大同鎮方面，韃靼部族也常靠近邊境放牧，嘉靖十五年至二十年(1536-1541)，史道(1485-1553)在大同巡撫任上，「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數千殍，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大邊之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住牧者。每遇會兵南搶，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邊界，公之威懾夷虜有如是者」。¹⁹⁹這段敘述雖然有些誇大，但可以看出牧民常在距邊三百里以內活動。隆慶和議以後，韃靼若干部酋的大營南移，甚至距離邊關僅數十里。如萬曆年間，鎮城陽和堡邊外二十餘里的鵝溝等處，有兀慎台吉之子朝台吉，與酋

¹⁹² 茅元儀(明)輯，《武備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 205，〈占度載·度十七·鎮戍二·遼東〉，頁 53-54。

¹⁹³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 10，〈夷部考·屬夷·薊鎮〉，頁 525-526。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 15，〈考部·貢夷考·朮顏〉，頁 493-520。

¹⁹⁴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卷 10，〈夷部考·屬夷·昌鎮〉，頁 526。

¹⁹⁵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三鎮總圖〉，頁 11。

¹⁹⁶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 62、122。

¹⁹⁷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 109-110、170。

¹⁹⁸ 茅元儀(明)輯，《武備志》，卷 205，〈占度載·度十七·鎮戍二·宣府〉，頁 58。

¹⁹⁹ 佚名(明)，〈兵部尚書鹿野史公道行狀〉，收入《國朝獻徵錄》，卷 39，頁 117。焦竑(明)撰，顧思點校，《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籌策〉，頁 63。

首屹力哥、倘不浪等駐牧。²⁰⁰陝北邊區，據茅元儀《武備志》記載：延綏鎮邊外神水灘大營，有河套酋首卜石兔住牧，與榆林鎮城相對，離邊三百餘里；榆林鎮城迤東之神木、孤山、黃甫川、建安一帶邊外，有酋首威正等部落住牧在樺子山、脫兒川、鎮川，離邊三百餘里；榆林鎮城迤西之嚮水、波羅、定邊一帶邊外，有夷人切盡黃台吉等部落注牧在黑河、打狼河、明水湖、跨馬梁，離邊二、三百里不等。²⁰¹

依照常理推斷，軍士出邊的安全距離，應該是雙方勢力的中線以內，以便在有事故時儘快撤回。本文第三節提到曹家寨高如桂所部，巳時出關採木，未時遇到伏襲；而馬蘭峪守軍出邊採木，在距邊二十三里處被撲殺。由此推斷，安全距離似乎並不遠。而萬曆十四年，薊遼總督王一鶚覆准每月定期出邊砍伐，提到的是「步兵結伍，聯隊而行，馬兵架梁，防護而出，距邊三、四十里外，堂堂採取」。（參見第二節）另外，薊遼總督譚綸提及「採柴砍板撫賞成規」，曾言「出採數十、百里外」（參見第三節），大約可以看出採伐地點最遠在百里內外。而此還必須看邊境情勢而定，如嘉靖中後期，蒙古時時南下勦掠，似乎不可能遠至百里處採伐。

第三，則是出邊的人數規模。明代雖在邊區駐守數量龐大的兵力，但卻是分散在各個關口。萬曆初年，郭造卿(1532-1593)在戚繼光麾下為幕友，熟知邊區諸多情況，其所撰《盧龍塞略》就記載該防區各關口戶數（參見表一），有些關口才數十戶，一次能出動的人數其實有限；少數幾處大的關口，戶數在一千以上，甚至達到二千多戶，則能集結較多的兵力。從本文所列舉的事例看來，大部分的情況下，每次的人數似乎不多，特別是軍士出邊樵薪，規模通常不大；而夜不收等哨兵至邊外刺探軍情，順便帶回板木，人數更是零星。在俺答等與明朝和議後，邊軍百人以上出口伐木，則有附近的牧民引領，這似乎表示百人以上較具侵略性，必須由牧民從中協助以免引起爭端。另外，在隆慶三年，建昌營為採木修建邊牆，出邊的兵力為三千人；萬曆二十年，錦州軍士出邊採木，因遭伏擊被殺三百餘人，其總兵力應該在一倍以上。（均參見第三節）至於出塞搗巢或燒荒時順便伐木，以及每年於春防、

²⁰⁰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大同鎮〉，頁 263。

²⁰¹ 茅元儀(明)輯，《武備志》，卷 207，〈占度載・度十九・鎮戍四・延綏〉，頁 77-78。

秋防時出邊大砍木材兩次，應該也都派出數千兵力，但這些則屬較為特殊的情況。

實際上，出邊的頻率、出邊的距離，與出邊的人數規模這三個指標，現在已無精確數據可以估算，但從正文的討論可知，從明初起，迄至晚明，出邊採薪雖然人數零星，但頻率應該不低，但其出邊距離不會太遠；至於為修築邊牆等工事出邊伐木，明中葉以後有增加之勢，人數規模較大，距離相對較遠；嘉靖年間出現的「採柴砍板撫賞成規」，與萬曆初年的開放軍民出邊砍材數日，因頻率與規模皆有所增長，為塞外森林帶來另一負面影響。十六世紀末以降，基於雙方的政治與經濟目的，遼西走廊的松嶺與北直隸的燕山，在河口出現了十餘處木市，牧民砍伐塞外的林木，運至關口交易，其數量雖不清楚，但對長城線外的植被同樣構成破壞。從長時段的角度看，長城線外的森林遭受砍伐，在明代持續擴大，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在空間的距離上，破壞最嚴重的範圍，當在數十里至百里以內。

有學者曾指出：距離長城較遠的燕山深處，因為人煙稀少，加上正統以後，明朝的軍事力量未達灤河中、上游，該地區一直是蒙古人的游牧地，所以原始森林基本上被保存下來。²⁰²其實，不用到離長城較遠的燕山深處，森林一樣茂盛。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唐時升(1551-1636)從盤山上，望見長城「蜿蜒如白龍」，山下則牧民的「毳幕疏密離合，如綦布然」。其時正值暮秋，樹葉翻黃變紅，「崖間樹色絢爛，如鷄冠，如翠羽，如蒸栗，吳羅、越錦不足為麗」。遠眺塞外，諸山若在几下，「長松離列，一一可辨，其中必多麋鹿狐兔，可以射獵，而中國嚴禁不許闌出，虜中亦無敢至者」。²⁰³可以看出，在邊境之北不遠，即有大片的松林。而郭造卿《盧龍塞略》也記載：東起山海關，西迄山口寨，各關口邊外數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多有一些樹林。²⁰⁴這種情況，在邊區似乎並不罕見，故崇禎十二年(1639)四月四日，兵部尚書楊嗣昌曾與明思宗說：「邊外樹木儘多，若於燒荒，砍伐下山，山下即水，待水起順流入口，其利無窮」。²⁰⁵

²⁰² 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的反思〉，頁 28。

²⁰³ 唐時升(明)，《三易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8 冊，卷 11，〈遊盤山記〉，頁 147-148。

²⁰⁴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 17，〈扼部・形險〉，頁 625-675。

²⁰⁵ 楊嗣昌(明)著，梁頌成輯校，《楊嗣昌集》（長沙：嶽麓書社，2005），卷 44，〈己卯四月初四日召對〉，頁 1069。

另外，遼西走廊的邊界之外，明末還有許多原始森林。萬曆十九年，侯先春巡按遼東，在奏疏提到：「瑞昌、永安、背陰障等三堡隔絕山外，林木稠密，虜時藏茂林中，伺而掠之。數十羸卒，閉門株守，莫敢啟關取薪水者，或半月、十日。」²⁰⁶天啟三年，茅元儀從錦州出塞，望見紅螺山如壁橫互於目前，但卻馳行八十里才到山麓，「望其巔之樹，尚大數十圍、高十許丈，不知探其本當幾許」。²⁰⁷可見紅螺山山頂樹木之巨大。²⁰⁸崇禎十年二月十五日，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1591-1644)奏言對抗女真之策，也提到遼西「塞外林箐深茂、山谿險峻之處，最易設伏布械，奴以此誘我使入，而坑我使不得出，非一次矣」。²⁰⁹這一段話也足以證明塞外森林猶然茂盛。

比較奇怪的是，郭造卿在《碣石叢談》說：上都附近的森林，「為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修邊臺、橋館萬役，今千里古松盡矣」。²¹⁰這一說法頗為離譜，不足採信。首先，胡守中所伐塞外林木數字過度被誇大，而且有說法指出樹木係明軍所植，則應該距離邊境不遠，筆者在第三節已經辯明。其次，千里古松在開平衛以北二百里，則距邊牆約八百餘里，晚明修築邊牆等工程，若穿越四百公里，抵達該處進行砍伐，中間必須經過無數蒙古部落，防護的兵力可能數千或更多，等於是一支不小的遠征軍，這樣的行動絕對會引起蒙古方面的緊張，產生沒有必要的糾紛，故其可能性不高。其三，木材必須搬運，太遠則費時耗工，至八百里以外採取，似乎不太可能。其四，若這片森林早就已經砍光，則清朝必然不會招商採伐，但實情卻是相反。康熙初年，王士禎(1634-1711)記塞外的森林云：

木產朶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

²⁰⁶ 侯先春(明)，《諫草》，卷上，〈安邊二十四議疏〉，頁 80a。

²⁰⁷ 茅元儀(明)，《石民四十集》，卷 19，〈閩紅螺制義序〉，頁 166。

²⁰⁸ 據清初史料記載：紅螺山在錦州城西六十五里，高五里，週圍五十餘里，「山上有大松數萬本，以險峻，故樵者罕及」。見劉源溥、孫成(清)纂修，(康熙)《錦州府志》，收入《遼海叢書》，第 2 冊，卷 1，〈輿地一·山川〉，頁 811。

²⁰⁹ 凌義渠(明)，《奏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93 冊，卷 4，頁 68。

²¹⁰ 顧炎武(明)編，《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 3 冊，〈北直下〉，頁 3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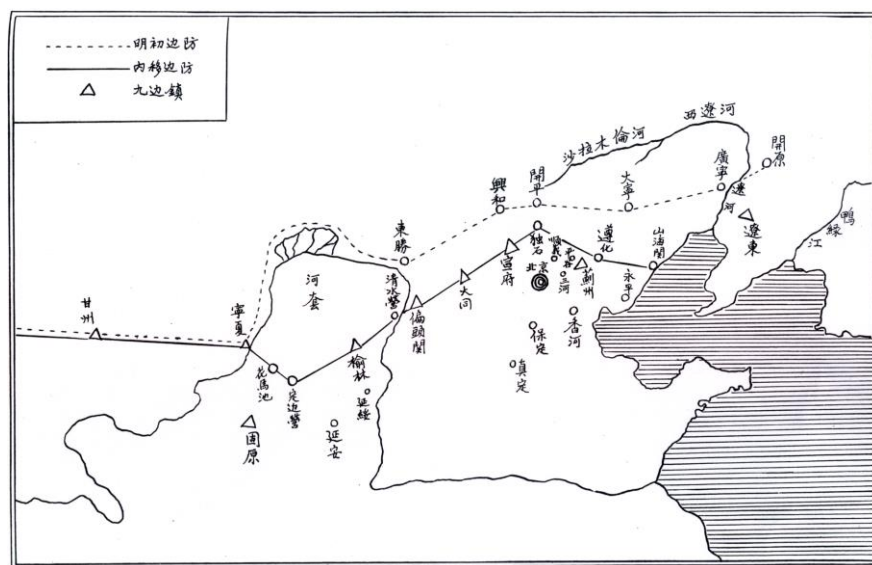
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跡。順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²¹¹

在這千餘里的邊山以北，主要屬於四大水系，東邊為大凌河流域，中間為灤河流域，西南為潮河流域，以及北部的西遼河流域。明代時，這一帶的植被覆蓋率極高，直至清朝初年，靠進長城之處依然林深木茂，如永平府盧龍縣口外，「山深險峻，松楸蔽空，虎豹豺狼之所窟也」；遷安縣口外尤其多松樹，「蓋出松亭關，乃古千里松林界」。²¹²然而，蓄養了數百年的塞北森林，在順治以降持續不斷砍伐，至乾隆年間已經消失過半，即使木蘭圍場也受到覬覦；前套的大青山已經無木可伐，穆納山亦開放招商採取樹木。²¹³

²¹¹ 王士禎(清)，《帶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4-1415 冊，《蠶尾文》卷 5，〈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頁 657。

²¹² 張朝琮(清)等續纂，(康熙)《永平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13 冊，卷 5，〈物產〉，頁 186、187。

²¹³ 景愛，〈木蘭圍場的破壞與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頁 90-105。趙珍，〈清代塞外圍場土地資源環境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1-142。黃治國，〈從封禁到開禁——清乾隆時期對穆納山木場的管理〉，《中央民族大學學報》，36:2(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2009)，頁 90-94。周林，〈清廷塞外木植採辦〉，《古今農業》，2011:2(北京：古今農業編輯部，2011)，頁 54-58。



圖一、明代北方邊防的內移

圖一、明代北方邊防的內移

※圖版來源：吳緝華，〈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頁 409。



圖二、宣府鎮渡口堡邊外的松林

※圖版來源：〔明〕楊時寧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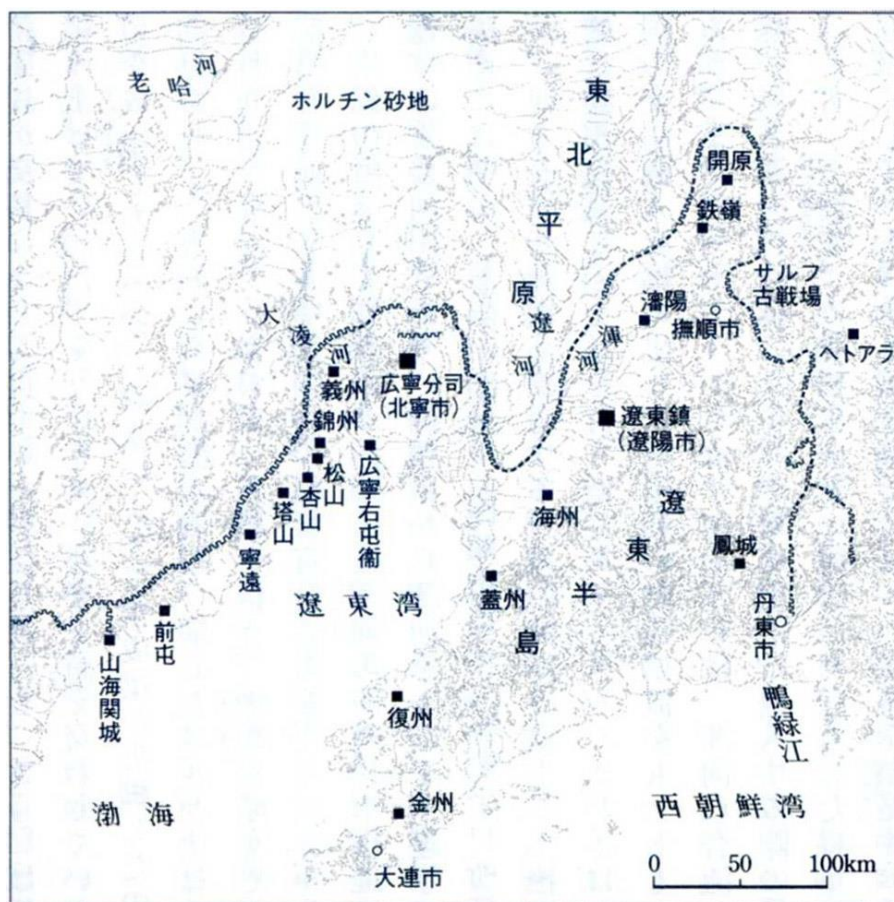
圖三、宣府鎮長伸地堡邊外的松林

※圖版來源：〔明〕楊時寧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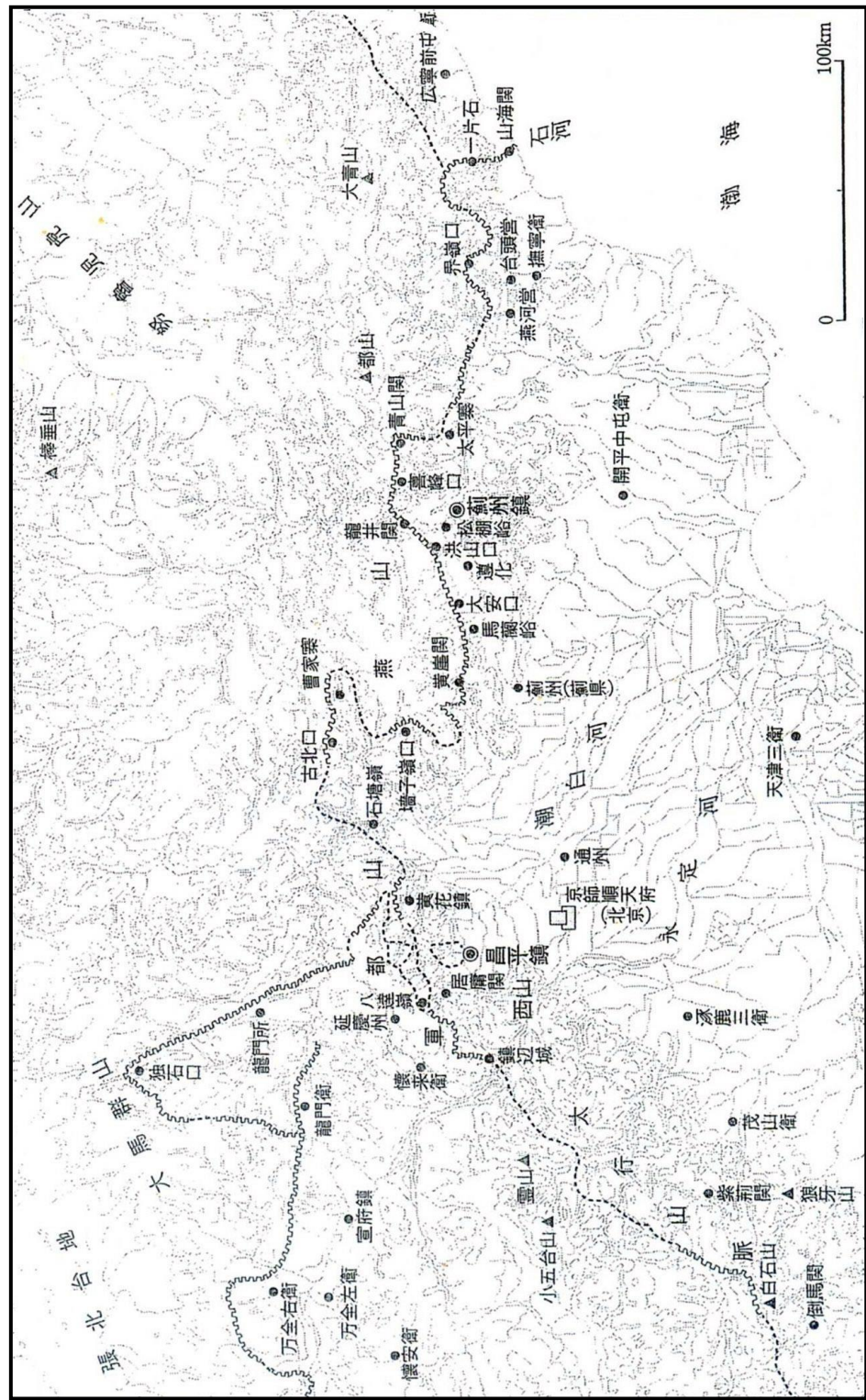
圖四、宣府鎮葛峪堡邊外的松林

※圖版來源：〔明〕楊時寧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宣府鎮〉，頁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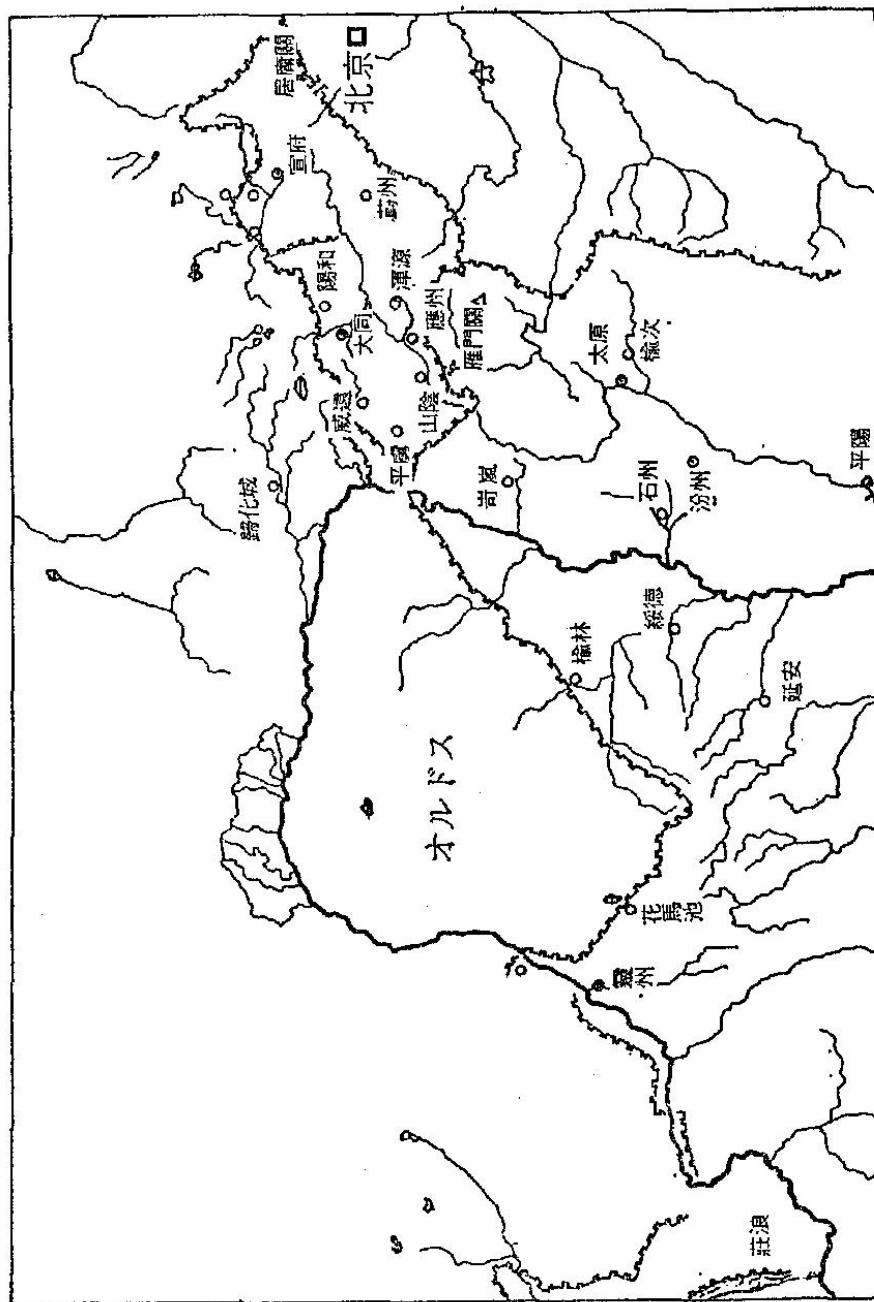
圖五、明代遼東鎮長城

※圖版來源：來村多加史，《萬里の長城・攻防三千年史》（東京：講談社，2003），頁 223。



圖六、明代薊鎮、宣府鎮長城

※圖版來源：來村多加史，《萬里的長城・攻防三千年史》，頁 228-229。



圖七、明代宣府以西長城

※圖版來源：荻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1），頁 219。



圖八、明末遼東木市(一)

※圖版來源：程開祜(明)輯，《籌遼碩畫》，卷首，〈遼東圖〉，頁18。



圖九、明末遼東木市(二)

※圖版來源：程開祜(明)輯，《籌遼碩畫》，卷首，〈遼東圖〉，頁19。

表一、《盧龍塞略》所載各關堡居住戶數

路	山海路						石門路							
關堡	山海關正城	山海關羅城	南海口	角山關	三道關	寺兒谷	石門關	一片石	廟山口	西陽谷	黃土嶺	炕兒谷	大青山	小河口
住家	1384	500餘	16	軍士18名	20	30	2006	177	25	46	72	80	39	29

路	石門路														
關堡	城子谷	娃娃谷	大毛山	董家口	柳河衝	水門寺	平頂谷	長谷駐操營	義院口	長谷口	板場谷	挈子谷	花場谷	葦子谷	平山營
住家	69	28	52	58	20	53	66	528	215	27	32	91	20	9	129

路	臺頭路										燕河路				
關堡	界嶺口	星星谷	中桑谷	箭桿嶺	羅漢堡	馬寨營	青山口	東勝寨	乾澗兒	青山駐操營	燕河關	桃林口	重谷口	梧桐口	正水谷
住家	371	36	81	186	50	110	114	59	81	273	1222	131	161	30	23

路	燕河路								太平路						
關堡	孤窯兒	劉家口	桃林營	冷口	徐流口	石門子	白道子	徐流營	太平關	擦崖子	白羊谷	五重安	新開嶺	城子嶺	五重安營
住家	40	122	349	126	95	91	93	250	1350	302	50	43	25	88	140

路	太平路				喜峯路								松棚路	
關堡	榆木嶺	大嶺寨	爛柴溝	青山營	喜峯口	董家口	青山口	遊鄉口	青山駐操營	李家谷	鐵門關	團亭寨	潘家口	西常谷
住家	123	44	58	81	845	112	38	22	169	83	34	31	120	109

路	松棚路					
關堡	三台山	龍井關	橡八谷	洪山口	西安谷	白棗谷
住家	99	120	22	45	45	27

資料來源：郭造卿(明)，《盧龍塞略》，卷4，〈表部・邊防表〉，頁162-177。

參考書目

A. 古籍(依筆劃順序)

于謙(明)，《于忠肅公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天啓間閩中沈昌裔刊本紙燒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丁編第六本。

巴泰(清)等奉敕撰，《世祖章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方孔炤(明)，《全邊略記》，臺北：廣文書局，1974。

毛憲(明)，《諫垣奏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22冊。

王一鶚(明)，《總督四鎮奏議》，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中央圖書館，1985，6-7冊。

王士琦(明)，《三雲籌俎考》，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8。

王士禎(清)，《帶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14-1415冊。

王在晉(明)編，《三朝遼事實錄》，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

王圻(明)，《續文獻通考》，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王樵(明)，《方麓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5冊。

白珽(元)，《湛淵遺稿》，臺北：興中書局，1964。

余子俊(明)，《余肅敏公經略公牘》，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10，第17冊。

吳仁度(明)，《吳繼疏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9，集部第172冊。

呂坤(明)撰，王國軒、王秀梅整理，《呂坤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李化龍(明)，《撫遼疏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69冊。

李東陽(明)等撰，《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李景隆(明)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李燾(宋)撰，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沈良才(明)，《沈大司馬鳳岡先生奏議》，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本。

- 汪道昆(明)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 岷峨老人(明)，《譯語》，收入沈節甫(明)輯，《紀錄彙編》，臺北：民智出版社，1965，卷 161。
- 岳和聲(明)，《餐微子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侯先春(明)，《諫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侯晟重刊本。
- 范守已(明)，《皇明肅皇外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2 冊。
- 茅元儀(明)，《石民四十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9-110 冊。
- 茅元儀(明)，《督師紀略》，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6 冊。
- 茅元儀(明)輯，《武備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凌義渠(明)，《奏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第 493 冊。
- 唐時升(明)，《三易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8 冊。
- 翁萬達(明)撰，朱仲玉、吳奎信校點，《翁萬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張四維(明)，《條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51 冊。
- 張廷玉(清)等撰，鄭天挺等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居正(明)等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張居正(明)等撰，《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張袞(明)，《張水南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6 冊。
- 張朝琮(清)等續纂，〔康熙〕《永平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13 冊。
- 張欽(明)纂修，(正德)《大同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6 冊。
- 張鼐(明)，《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6-77 冊。
- 戚繼光(明)撰，張德信校釋，《戚少保奏議》，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曹學佺(明)，《石倉文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67 冊。
- 畢自嚴(明)，《度支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83-490 冊。
- 郭造卿(明)，《盧龍塞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陳子龍(明)等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4。
- 陳文(明)等撰，《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陳建(明)，《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卷 30，頁 336。

- 陳第(明)，《一齋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刊本。
- 陶宗儀(明)，《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焦竑(明)撰，顧思點校，《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
- 焦竑(明)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0-106冊。
- 程開祜(明)輯，《籌遼碩畫》，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8。
- 賀欽(明)，《醫間先生集》，收入《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第4集，第1-2冊。
- 項篤壽(明)，《小司馬奏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78冊。
- 黃瑜(明)撰，魏連科點校，《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 楊士奇(明)等撰，《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楊士奇(明)等撰，《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楊守謙(明)，《大寧考》，成都：巴蜀書社，1993。
- 楊時寧(明)編，《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臺北：正中書局，1981。
- 楊博(明)，《楊襄毅公本兵疏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61冊。
- 楊嗣昌(明)著，梁頌成輯校，《楊嗣昌集》，長沙：嶽麓書社，2005。
- 溫體仁(明)等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葉隆禮(宋)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過庭訓(明)輯，《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3-536冊。
- 雷禮(明)輯，《國朝列卿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92-94冊。
- 熊廷弼(明)，《按遼疏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91冊。
- 熊廷弼(明)，《遼中書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2冊。
- 劉吉(明)等撰，《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劉效祖(明)，《四鎮三關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0冊。
- 劉源溥、孫成(清)纂修，(康熙)《錦州府志》，收入《遼海叢書》，第2冊。
- 鄭曉(明)，《吾學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12冊。
- 鄧士龍(明)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盧象昇(明)，《盧象昇疏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本，1984。
- 蕭大亨(明)，《北虜風俗》，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
- 戴金(明)編，《皇明法條事類纂》，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 薛三才(明),《薛恭敏公奏疏》,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韓邦奇(明),《苑洛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一年刊本。
- 瞿九思(明),《萬曆武功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35-36冊。
- 龐尚鵬(明),《百可亭摘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29冊。
- 譚綸(明),《譚襄敏公奏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八年刊本。
- 嚴從簡(明)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 顧九思(明),《掖垣題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4冊。
- 顧炎武(清)撰,譚其驤等點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顧炎武(清)編,《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顧秉謙(明)等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顧祖禹(清)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B. 中文專書

- 艾衡,《明代陝西四鎮長城》,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吳晗,《讀史劄記》,北京:三聯書店,1956。
-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
- 景愛,《中國長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華夏子,《明長城考實》,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 劉謙,《明遼東鎮長城及防禦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C. 外文專書

- 阪倉篤秀,《長城の中國史》,東京:講談社,2004。
- 來村多加史,《萬里の長城・攻防三千年史》,東京:講談社,2003。
- 荻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1。
- Serruys, Henry,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5.
-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 中文期刊論文

- 于希賢，〈北京地區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壞過程及其後果〉，《環境變遷研究》，第1輯，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頁98-114。
- 尹鈞科，〈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植被的破壞〉，《歷史地理》，第19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51-269。
- 尤淑君，〈北平行都司的設置、內徙及其影響〉，《政大史粹》，20，臺北：政大歷史系，2011，頁1-39。
- 白鳳歧，〈淺談明清時期遼寧蒙古族的經濟〉，《滿族研究》，1991:4，瀋陽市：遼寧省民族研究所，1991，頁79-88。
- 余同元，〈明代馬市市場考〉，《民族研究》，1998:1，北京：民族研究雜誌社，1998，頁62-70。
- 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5，頁55-70。
- 吳緝華，〈明代西北邊患與榆林的發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275-295。
- 吳緝華，〈明代延綏鎮的地域及其軍事地位〉，《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臺北：亞洲歷史學家協會編輯委員會，1963，頁113-123。
- 吳緝華，〈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頁649-660。
- 吳緝華，〈論明代北方邊防內移及影響〉，《新亞學報》，13，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1980，頁363-409。
- 吳緝華，〈論明代築萬里長城守邊的失策〉，《東海大學歷史學報》，5，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1982，頁13-36。
- 吳緝華，〈論明代邊防內移與長城修築〉，《東海大學歷史學報》，4，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1981，頁25-47。
- 李漱芳，〈明代邊牆沿革史略〉，《禹貢半月刊》，5:1，北平：禹貢學會，1936，頁3-17。
- 杜婉言，〈明代木市初議〉，《社會科學戰線》，1985:2，長春市：吉林省社會科學院，1985，頁146-147。
- 周林，〈清廷塞外木植採辦〉，《古今農業》，2011:2，北京：古今農業編輯部，2011，頁54-60。
- 松本隆晴著，南炳文譯，〈試論余子俊修築的萬里長城〉，《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1994:1, 頁 38-56。

邱仲麟,〈明代燒荒考——兼及其生態影響〉,《臺大歷史學報》,3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6,頁 25-63。

邱仲麟,〈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明代研究》,8,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5,頁 1-49。

特木勒,〈小歹青身世與義州木市〉,《民族研究》,2010:4,北京:民族研究雜誌社,2010,頁 90-93。

袁森坡,〈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的反思〉,《河北學刊》,1986:2,石家莊:河北學刊雜誌社,1986,頁 26-31。

曹永年,〈「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考誤〉,《歷史研究》,1996: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6,頁 161-171。

景愛,〈木蘭圍場的破壞與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輯部,頁89-119。

景愛,〈平地松林的變遷與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4,西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編輯部,頁25-38。

黃治國,〈從封禁到開禁——清乾隆時期對穆納山木場的管理〉,《中央民族大學學報》,36:2,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2009,頁 90-94。

趙珍,〈清代塞外圍場土地資源環境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0-147。

暴鴻昌,〈明代長城區域的森林採伐與禁伐〉,《學術交流》,1991:3,哈爾濱:學術交流雜誌社,1991,頁 123-125。

暴鴻昌、景戎華,〈明清濫伐森林對生態的破壞〉,《平準學刊》,第3輯,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上冊,頁 143-156。

蕭國亮,〈明代後期蒙漢互市及其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雜誌社,1987,頁 65-70。

E. 外文期刊論文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史淵》,90,福岡市:九州大學文學部,1963,頁 67-94。

江嶋壽雄,〈明末遼東の互市場補遺〉,《史淵》,100,福岡市:九州大學文學部,1968,頁 157-167。

